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2014年,全市史志部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恪守存史、资政、育人基本职责,统筹推进,保持了史志事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市委党史工办获得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考评二等奖,各县区史志部门也在县委、县政府的目标考核中获得较好成绩。2015年全市史志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现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李克强总理“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重要批示精神,以创新的精神推动解决史志事业发展难题,深化党史国史学习宣传教育,积极探索史志编研和宣传教育新模式,努力提升编研成果的影响力和辐射面。工办主任苏中保同志的《凝心聚力 开拓创新 努力开创史志工作新局面——在全市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吹响了2015年全市史志工作奋进前行的号角,本期特刊发以供全市史志工作者学习贯彻。

抗日战争时期的滨海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五大战略区之一,它地处苏北鲁南,是沟通华北和苏中的重要节点。南起陇海铁路,北抵胶济铁路,东滨黄海,西界沂河。地形长方,由东北斜向西南,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战时辖赣榆、海陵、沐水、芦山、临沐、邳城、莒南、莒中、日照、莒北、日北、诸城、苍马等1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人口约500万。抗战时期,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中共山东分局等党政军机关曾驻扎在这里,它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详见《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滨海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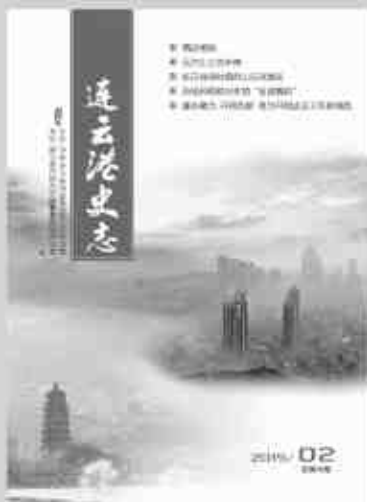
巍峨连绵的云台山像一条蜿蜒的巨龙屹立于黄海之滨、海州湾畔,七十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壮烈的连云港保卫战。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守军

以顽强的斗志和一腔爱国情怀,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日寇疯狂的进攻,捍卫了中国军队和中华儿女的尊严,牵制了日寇在苏北乃至全国战局的进展,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直至今日,云台山地区仍保存着不少当年中国抗战守军留下的石刻,这些石刻都是见证这一段悲壮历史最好的实物资料。详见《云台山上的丰碑——抗日石刻与连云港保卫战》。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正义斗争,博得了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就是其中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我市有一位研究日本人民反战运动达58年之久的学者孙金科,他曾被日本华语媒体称为“国际上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第一人”。今年80高龄的孙老先后出版了《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国统区日人反战运动》等5部专著,发表“反战”论文80多篇,文稿超过200万字,是国际研究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史的知名专家。详见《孙金科和他58年的“反战情结”》。

杨纯,四川峨眉人,1917年出生于北京。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山东淄博特委组织部长,皖东北特委书记,苏皖区党委二地委书记(管辖东海、灌云、沭阳、宿迁等几个县),苏皖二、三地委书记,盐阜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周恩来总理秘书,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她是一名神枪手,她是一位骑士……她被誉为“巾帼英杰”。她对曾经战斗过的苏北、连云港怀有深情。详见许燕蓂撰写的《两访杨纯》。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刘轲征
许燕塞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云
韩世泳

主任: 苏中保

副主任: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委员 (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淙 王滨
白植明 朱荣
刘鹏 邱仕明
何洪斌 姜龙才
郝芳 韩翠林

主编: 苏中保

副主编: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文字总校: 张俊鹏

目

特 载

04 凝心聚力 开拓创新 努力开创史志工作新局面

——在全市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苏中保

学习心得

08 编史修志以育人 鉴古知今以资政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 于冰清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专栏

11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滨海区

/ 葛永明

13 万毅避难西朱范

/ 王晓华

16 云台山上的丰碑

——抗日石刻与连云港保卫战(上)

/ 李彬

19 我父亲是侵华日军害死的

/ 董桂芬

21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二)

/ 本刊编辑部

历史与发展

24 连云港商品集散地和海运枢纽港历史地位的形成

/ 刘凤桂

往事追忆

27 两访杨纯

/ 许燕塞

郁洲溯源

30 也说“新浦”

/ 韩世泳

33 海浦观潮说水流——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八

/ 伏广喜 同祥富 杨庆昌



录

志鉴论坛

- 36 浅析地方史志资料的开发与利用 / 贾栋钰

人物春秋

- 38 抗日英雄胡文臣 / 黄正明
40 刘明官与《大社的优越性》 / 张学贤
44 孙金科和他 58 年的“反战情结” / 祝新华

地方文化研究

- 46 中国古岩画艺术探析 / 李 晗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血战连云

——连云港抗战石刻精选

启 事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加快推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关键之年、“十二五”建设的收官之年。本刊重点组稿选题如下:

1. 关于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反映侵华日军在连云港犯下的罪行, 反映海属军民奋起抗击入侵, 论述海属抗战的重要历史价值等。

2.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与连云港。追述海城历史上西向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 东向穿越海洋与外地交流的历史。

3.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连云港市范围内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等。

热诚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函来稿。

本刊编辑部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 址: 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69 号

邮 编: 222006

网 址: www.lyasz.gov.cn

电子邮箱: LYashitan@163.com

电 话: (0518) 85825137 85821368

印 刷: 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 苏新出准印 JS—G033 号

出版日期: 2015 年 4 月

2015 年第 2 期总第 98 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凝心聚力 开拓创新 努力开创史志工作新局面

——在全市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3月30日

苏中保

同志们：

这次全市史志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去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今年工作。回顾去年的工作，值得总结的很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动作为，党史研究推出一批新成果

一是在全省率先出版发行市县党史“三卷本”丛书，即《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史》《中共赣榆县地方史》《中共东海县地方史》《中共灌云县地方史》和《中共灌南县地方史》。在此基础上，开展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连云港历史，即党史“三卷本”专题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编纂出版《中共连云港市历史大事记》和《中共连云港市文献汇编》。灌云县完成党史“三卷本”初稿，走在了全市前列。

二是深入推进“革命前辈影像资料抢救工程”，完成我市抗战时期约260余名老干部、老战士、老党员采访任务，采集高清视频资料约15000分钟，征集反映革命历史的实物、照片、文献、手稿等资料2000余件。

三是编辑出版了《红色记忆》（第一辑）、《红色东海——东海革命烈士十故事选》《铁血颂歌——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巍巍丰碑——灌南

革命烈士传》《刘少奇在东海》《刘少奇在大树》《纪念符竹庭将军殉国70周年书画集》等党史通俗读物。

四是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新中国成立65周年、江苏解放65周年等主题，积极开展党史专题研究，撰写党史专题研究文章40多篇，在省委党史工办研讨会上交流，或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

二、共同发力，二轮修志快速推进，地情工作开启新模式

一是二轮志书编修进度在全省位次前移4位。《海州区志》《连云区志》《新浦区新志》正式出版，《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通过验收，付梓。《连云港市志》126家承编单位中，已有123家志稿通过评审，其余3家初稿处于修改中；总体上分纂完成超过70%。《东海县志》《灌南县志》《灌云县志》基本完成总纂；《赣榆县志》共36编，基本完成分纂31编。

二是2014卷《连云港年鉴》全国获奖。2014卷《连云港年鉴》编纂框架16年来首次采取大编体、四级结构，得到中指组和省志办专家的肯定，在中国版协组织的质量评比中获“综合奖二等奖”“框架



设计一等奖”“条目编写二等奖”和“装帧设计二等奖”4个奖项。截至2014年年底,连云港年鉴丛书(含市本级及东海、灌云、灌南三县和赣榆、海州、连云三区)共7本综合年鉴全部出版发行,成书总字数达700万字。

三是编纂出版了《海州史话》《连云文化概览》、《锦绣连云》《灌云旅游概览》等地情书籍;推动《连云港市人大志》《连云港市总工会志》《东海县地震志》《灌南县人大志》《连云区政协志》等部门志、行业志出版发行。

四是开展市情馆筹建工作,已征集各类地情资料近6000册,主要包括志书、地情书368种1830册、年鉴511种2553册、社科类资料500余种及党史资料、相关杂志1000余册。

三、创新平台,史志宣传教育开创新境界

一是市革命纪念馆成为全市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德育基地。2014年,市革命纪念馆充分发挥党史教育主阵地作用,主动服务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高质量接待了市四套班子领导及省内外团体参观学习任务,累计接待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团队400批次,5万余人。全年举办纪念谷牧同志诞辰100周年专题展、“新四军与老百姓——群众路线专题展”、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区30周年成就展等专题展6场,放映红色经典电影200余场,建设国防教育园,成功创建“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全年累计旅游团队1690批次,约23.8万人进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省市领导王燕文、杨省世、赵晓江等先后参观调研市革命纪念馆,给予肯定。市革命纪念馆与全市90余家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签订共建教育基地协议,成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基地;与市级机关工委、市委党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新党员的必修课。

二是宣教工作的载体和形式更加多样化。围绕连云港沿海开放30周年主题,与市委宣传部联合编纂《云路飞歌——连云港对外开放30年纪实》,与《连云港日报》《苍梧晚报》合作开设“开放30年谁立潮头”和“三十而立”专栏11期,7个版面。在全省率先开通公众微信平台“连云港史志”,以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相结合的形式,每天传播党史、

地方史知识。利用“革命前辈影像资料抢救工程”采访素材,制作播出《连云港保卫战》《赣榆战役》《孤胆英雄宋继柳》等红色影视作品,其中,《连云港保卫战》《赣榆战役》成为全市党员“固定学习日”教材。赣榆区制作的党史纪录片《抗日山》获省“五个一工程”奖,开辟了党史宣传教育的新境界。内刊《连云港史志》围绕市委、市政府及史志工作重点,开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连云港沿海开放30周年专栏,增强了贴近性,被评为市“第四届优秀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市史志网站立足现有条件,加快史志编研成果上网进程,充实完善更新各级栏目内容,年点击率突破20万人次。

三是“六讲”活动扎实深入。全年赠送史志书籍近万册,开展专题讲座200余场,举办“清明祭忆——革命后代现身说史”“迎七一·我是革命接班人”、烈士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等主题教育活动20余场。

四、立行立改,史志干部队伍形成新风貌

市史志部门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六查六看”活动,着力解决“庸懒散浮满”等问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开展学习教育、座谈研讨活动60多次,整治“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83个,修订完善规章制度56项。市史志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负责做好分管处室的廉政建设工作,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市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房阳获省导游员大赛第一名。4名同志被提拔为副科职,1名同志明确为副科级。市委党史工办档案工作连续7年获评优秀格次。“三公”经费支出比上年压缩50%以上,新购置史志书籍2000多册,更新电脑、打印机、照相机等办公设备17台,大大改善了办公条件。各县区史志机构基本做到机构到位、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办公条件大为改观,干事创业的氛围浓郁,形成了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史志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勤奋敬业、扎实工作的结果。

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我市史志工作上台阶、出成果、出精品,谋求新突破的关键之年。史志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一是“四个全面”对史志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总体布局。特别强调江苏是党史资源、文化资源大省,要用活、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好党史、国情教育,抓好党建就是最大的政治。这些为做好史志工作指明了方向。史志工作既是“四个全面”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更是文化基础工作,同时也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是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给史志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从国际上看,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我们的渗透、扭曲和颠覆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他们拿党史国史说事,想方设法歪曲我们党的历史、丑化我们党的形象、诋毁我们党的领袖,否定新民主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国内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法治和反腐已经成为当前的新常态。这就需要史志工作者及时记载、总结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创新实践和新鲜经验。当前,全市上下正积极抢抓“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沿海开发等重大历史机遇,为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港城而奋斗。新的形势对史志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深入研究我市加快发展的经验,用丰厚的史料和独到的研究成果,服务连云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以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少年为重点,积极推动全社会的史志宣传教育,用史志优秀成果这一最有力的教材教育人民,把革命前辈的崇高精神转化为推动全市上下科学发展的巨大力量。

三是我市丰富的史志资源还有待我们更深入地挖掘、整理。连云港历史源远流长,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谷牧等同志都在连云港战斗和生活过,发生过连云港保卫战、赣榆战役、小沙东海战等大小战斗百余次,4241名烈士英勇牺牲,留存各类革命遗址遗迹153处。改革开放新时期,连云港涌现出以“雷锋车”组、开山岛“夫妻哨”、“港城叶欣仁”等为代表的一批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这些都需要我们史志部门进一步挖掘、整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加具有震撼人心、塑造灵魂的作用,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爱国爱家乡热情,坚定全市人民推动港城科学发展的信

心和决心。

基于以上认识,2015年全市史志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李克强总理“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重要批示,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以法治的方式推进史志工作,以创新的精神推动解决史志事业发展难题,以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力量,深化党史国史学习宣传教育,积极探索史志编研和宣传教育新模式,努力提升编研成果的影响力和辐射面,为践行“四个全面”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紧跟时代发展,打造精品良志。史志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客观公正地记载和反映连云港地区的历史。按照“一突出两跟进”的要求,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连云港党史研究工作。总结、运用“革命前辈影像资料抢救工程”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加大史料征集力度,加快征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老党员、老模范的口述史、回忆录和图文资料,并妥善保管、精心整理和有效利用。要做好党史正本编写工作,集中力量完成党史“三卷本”编写任务。各县区要以编写党史大事记、党代会资料汇编、组织史资料为载体,做好史料集成,进一步夯实党史研究的资料基础。特别是要按照即时跟进历史步伐的要求,及时征集、记载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地丰富生动的实践资料收集好、整理好。

加大地情资料的研究、整理、开发工作力度,全力完成修志编鉴目标任务。坚持质量第一要求,把好政治关、体例关、史实关、保密关、文字关,着力提升二轮志书质量。加快二轮修志进度,年内,《连云港市志》要完成送审稿,各县区二轮志书要出版发行。同时,积极推动开展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指导和服务。已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的单位要开展资料长编的编写,做好第三轮修志的基础准备工作。要提高年鉴编纂质量。2014卷《连云港年鉴》质量有了较大提升,在全国评奖中获得综合二等奖,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县区年鉴都还没有入围。要总结提炼年鉴编纂经验,加强业务交流、培训和指导,规范编纂



流程,推广年鉴出版前审读制度,拓展年鉴信息资料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探索音像版年鉴,做到内容全面、事实清楚、文字差错率更低、装帧更有品味、形式更灵活,力争在全国、全省评优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要做到一年一鉴、当年编纂、当年出版,使年鉴真正成为翔实可靠的年度地情文献。扎实推进市情馆建设,加大依法征集地方志资料的力度,力争将市情馆建设成为我市方志资料和地域文化的收藏、展示、研究、管理中心。各县区不仅要配合做好市情馆资料征集工作,而且要为本县区建设地情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二抢抓重大机遇,开展好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今年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将隆重举办有关纪念活动。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宣教工作和宣教阵地的优势,早做预案,积极参与,认真做好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扩大党史工作的社会影响。市委党史工办将重点开展五项纪念活动,一是编辑出版《连云港抗战志》《我家乡的抗战》等抗战系列图书;二是制作 4 部抗战主题电视专题片和连云港历史 3D 片《筑梦连云港》(暂定名);三是举办“我家乡的抗战”征文活动;四是举办抗战专题展览;五是开展“抗战主题老电影放映季”活动。各县区党史部门也要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宣传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三不断创新载体,增强党史、市情教育实效性。我们的地方党史书籍、地方志书记载了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曲折历程,这些本乡本土的史实,是对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好教材。要针对他们不同的阅读需求和接受特点,将党史、地方志书籍转化成为大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电视片、电影、通俗读物等多种史志文化系列“产品”。积极组织编写史志普及读物,市级编写《花果山下海边州——连云港市情简明读本》《云霄海曙——连云港党史简明读本》(党员干部读本)等适合不同对象阅读的教材和读物。各县区史志部门也要充分利用编史修志资料,编写各种地情书、简志和乡土教材。同时,切实做好史志学习教育服务保障,以党员领导干部

为重点,主动会同组织、宣传、党校、教育等部门,探索建立党史学习教育协作机制,推动各级党委(党组)把党史专题纳入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把党史教育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学体系,组织专家集体备课,开展“菜单式”点讲服务。积极宣讲史志知识进学校、进课堂,在广大青少年学生中普及党史、地方史知识。综合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党建网站、史志网站、微信等媒体,切实增强学习教育的效果。

要进一步发挥市革命纪念馆的平台和集中展示优势,积极开展省级廉政教育基地、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和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建工作。

四主动服务发展,提升史志资政功能。加强对市中共党史学会和市地方志学会的管理,组织开展学术研讨、联谊联络、论文评选等活动,发挥学会联系党史方志专家学者的桥梁纽带作用。要充分发挥市中共党史学会、市地方志学会“人才库”作用,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认真总结连云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积极开展资政课题研究,为全市新一轮发展及科学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要进一步强化阵地意识和责任担当,坚定地站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第一线,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组织党史网军,主动介入网络、微信平台,对党史领域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和言论,主动发声,敢于亮剑。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以充分的历史事实和对历史现象的科学解读,教育干部群众,引导社会舆论,回击谣言谬论,当好党的忠诚卫士。

五着眼长远发展,科学编制“十三五”党史地方志工作规划。今年是《江苏省 2011—2015 党史工作规划》和《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十二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市县史志部门要认真回顾总结执行情况,在全面总结规划实施情况的基础上,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史志工作科学发展的需要和最新的全国、全省党史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及早启动“十三五”党史地方志工作规划编制工作。

(作者系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办、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 于冰洁



编史修志以育人 鉴古知今以资政

——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于冰清

1989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深刻认识修志意义 认真做好修志工作”的讲话。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高屋建瓴,具体系统,深刻阐述了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一件相当‘得志’的工作”。适逢全市二轮修志工作进入攻坚时期,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对史志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以史鉴今 服务现实——“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于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才能使人们从一种混沌状态,转为一种清楚明白的状态。”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一个地方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资料文献,综合反映了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地方志所载大量地情,早在古代便被称为“一方之全史”,在保存历史、鉴古知今、明察地情、裨益民生、褒正抑邪、教化风尚、民族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历来被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地方志不仅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文化载体,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问道修志,以启未来”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编史修志的重要意义。

存信史。习近平同志强调:“志书要注意质量,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时代发展了,科学分工越来越细,我们一定要在规模、质量上超过前人。现在的志书都要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因此,我们更

需要注重质量。各部门都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社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从古至今,史志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代代传写,主要在于其存史功能。地方志持续不断的记录各个时期各地区自然、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历史,能为后世提供全面系统、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素有“补史之阙,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要研究国情、地情、行情,更离不开史志。当前,江苏沿海开发、长三角一体化、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合作示范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等四大国家战略聚焦连云港,全市上下正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推进现代化国际海港中心城市建设。及时记载、总结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新时期建设史,结合对外开放新背景下的二轮修志和地方党史“三卷本”编修工作,继续深化对连云港地情资料的挖掘,征集整理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大决策的相关资料,全面系统地反映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以及建设前景,为连云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纪实与宣传作出贡献。这充分体现了志书的“存史”价值。

育好人。习近平同志强调:“修志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材,没有历史何以爱国?爱国主义教育、英雄主义教育、美德教育,都要从历史中去吸取养分,搞文化虚无主义是不行的。”“大量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无不对今人,也必将对后人起到一个启蒙作用、振奋作用。”习近平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史志的教育功能,深刻地阐述了史志在开展国情教育、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自古修志者就注重志书的教化育人功能，强调志书“扬善惩恶，表彰风化”。旧志书中罗列有忠孝节义的人物传记，借这些先哲往事对后人起到砥砺名节、正定风俗的作用，正是反映了志书所具有的教化育人的功能。连云港的史志编修汇集文史艺术、革命先烈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先锋等各个方面的杰出人物及事迹，尤其是结合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相应的展厅，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引导全市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建设发展连云港凝聚正能量。

资善政。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志会议上讲话一开始就强调：“我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对于史志的资政功能，他鞭辟入里地分析总结：“志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为现实工作服务的有利辅助手段。我们是搞领导工作的，‘以古为鉴’可达到‘知己知彼’作出科学的决策。”作为地情书，史志是资政最直接的工具。“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史上官员以史志资政的例子不胜枚举，前有韩愈讨岭南时，借《韶州图经》了解地情；后有朱熹下车伊始，问《南康郡志》以知人文。作为一方执政者，必须充分把握当地历史发展规律，才能科学布局生产力，确立地方经济发展战略。连云港二轮修志以及党史编修工作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载了连云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为当前连云港奋力搭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平台、提高沿海开放水平提供资料依据和科学参考。

史志薪火相传，既是客观的文化载体，又是厚重的历史积淀，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二、众手成志 任重道远——“修志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

连云港市二轮修志自2005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市委、市政府对修志工作高度重视，将其纳入“文化连云港”建设范畴，动员各方力量，推进全市二轮修志有序开展。经过多年努力，全市二轮修志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纵观修志历程，能深刻地体会到习近平同志在会上指出的“修志是一件十分艰巨

的工作”。

（一）资料收集是修志工作的基础

资料是志书的命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翔实的资料，要编纂出高质量的志书是不可能的。首先，历年来各部门单位积累的档案比较分散，难以横排门类；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导致资料流失的现象多有存在。其次，收集到的资料浩如烟海，如何选择出符合志书要求的资料又要大费工夫。资料的真实性需要志书编纂者有较高的鉴别能力以及深入的调查研究，曾有修志者概括为“七分资料三分写”，可见资料收集确实是一项复杂艰巨且极其重要的工作。

资料收集工作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贯穿于志书编纂工作始终的，并且应在修志工作展开之前就做好每年的资料收录和整理工作，做到未雨绸缪。要充分利用好年鉴。志书资料难以收集全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年限跨度长导致资料流失，而年鉴作为一年一编的资料性工具书可以保证志书整体上“纵不断线”。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网络具有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受众面大、信息及时、互动等特点，可以更加全面、快捷、准确地收集资料，还可以通过网络对已收集资料的准确性、有效性、时效性等予以检验和印证。

（二）协作机制是修志进度的保证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修志是一项系统工程，要靠上下同步，左右协作，靠部门完成分志。”在实际的操作中，各部门单位承编的工作量不同、领导重视程度不一、是否专门组织编修队伍等因素都导致修志工作进程不同，也直接导致志书整体进程缓慢。各承编单位编纂的分志是市志这项系统工程的基石，根基不稳，将导致整个工程的失败。

为避免承编单位敷衍了事、互相扯皮，应实行承编责任制和修志工作督查通报制度。与各单位签订二轮修志承编责任书，明确承编任务，并定期对人员到位情况以及业务进展情况开展督查通报，推动修志工作全面均衡发展。

（三）修志队伍决定着志书的质量

修志年限跨度时间长，要全面、准确地记录社会发展历史，必须要有一支高水平的修志队伍。目前，全国多数地区存在修志队伍不到位或者修志队伍素质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基层机构。参加过首轮修志的业务骨干大多已退休，由于编史修志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新招录的年轻修志者客观上存



在理论和实践的不足,使得修志队伍青黄不接。另外,有些基层部门修志编制较少,难以组成专业的修志队伍,导致修志进度一拖再拖。

习近平同志在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充分重视修志工作,既要用好现有人员,又要发现新人才,可以聘请离退休的老同志参加修志,同时积极培育一些有志于修志的大学生充实修志队伍。定期对史志部门的工作人员、各承编单位的撰稿人以及外聘的修志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理论学习,提高修志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起完善的专兼职修志网络。

(四) 经费是修志工作的物质保障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条例实施以来,史志机构的办公经费、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观,但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增加的费用难以得到落实,比如外聘人员、举办业务培训等费用。

“‘地穷’志不能短,修志也不能短。”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修志的钱还是要挤出来。”史志机构要积极与领导沟通,主动反映修志困难和问题,务必落实好《地方志工作条例》,实现“一纳入、五到位”,并加大修志工作的宣传力度,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三、立志有为 开拓创新——“修志是一件相当‘得志’的事情”

(一) 要秉持崇高的工作理念,求真存实

习近平同志认为修志的意义不亚于建一座大桥、修一个博物馆,甚至更久远。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把修史看作是“经世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明清思想家王夫之则曰:“史乃‘迷往以为来者师也,经世之大略’。”可见,修志是一项崇高而又神圣的事业,史志工作是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为史志工作者,我们要秉持崇高的信念,以求真存实的作风对待史志工作;要发扬自重、自强、自信的乐观精神,摒弃“修志者不得志,得志者不修志”的悲观情绪;要胸怀一颗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平常心,崇尚实干。全市史志工作者要坚持把传承历史、服务现实作为根本任务,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把史志工作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发展大局中审视和谋划。

(二) 要坚持有效的工作方法,创新思路

古今善治者,必审时度势。史志工作必须把地情资源与时代特色紧密结合起来,凡是有利于史志事业发展的事情都要大胆去探索、突破和创新。转变工作方法主要有三点:首先,由原来的单纯编史修志向综合开发利用地情资源转变。连云港有丰富的历史人文、革命精神以及建设先锋等史志资源,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打开思路,将重要历史节点与相应资源整合起来,精心策划地情开发选题,推出具有地方特色、展示建设成果、反映群众需求的地情研究成果。其次,由史志部门单兵作战向合力联系有关部门转变。作为编修“一方之全史”的部门,不能闭门造车,坐等各相关单位报送史志资料,应抓住主动权,充分了解全市各行各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根据具体工作主动对接相关单位,并与市情结合,抓住机遇,拓宽史志工作的领域。

(三) 要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

史志工作者应大力发扬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求真是做好史志工作的必然要求。修志者必须秉持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注重调查研究,去伪存真,真实地记录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地方志是为党存史、为民立言的历史传承,史志工作是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史志工作者必须坚持求实的工作态度,踏实苦干,编修出党和群众满意的史书。求新是编修精品良志的必然途径。以党委政府的工作为中心、以社会建设发展为脉络的史志工作必须坚持创新精神,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要以思想的解放、思路的转变和方法的创新,推动史志工作的大发展。

习近平同志形象地将编史修志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分析其难点要点,切中肯綮,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要求领导干部克服畏难情绪,完成历史重任,更指出修志者为“有功之臣”。为此,史志工作者应不断总结史志成果编纂的经验与教训,负责任地为社会编修出“经世致用”的志书。我们不仅要修志而且要用志,领导干部与专业工作人员应善于“以史为鉴”,主动自觉地运用史志成果指导工作实践,提高社会对史志工作的认识及对历史的认识,充分发挥史志成果的“存史、育人、资政”的整体功能,实现史志工作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相互促进与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滨海区

葛永明



1943年滨海区图

赣榆,抗日战争时期隶属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创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

滨海区,南起陇海铁路,北抵胶济铁路,东滨黄海,西界沂河。地形长方,由东北斜向西南,东西最宽处约200公里,南北最长处约300公里,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战时辖赣榆、海陵、沐水、芦山、临沭、郯城、莒南、莒中、日照、莒临边、莒北、日北、诸城、莒诸边、诸胶边、

苍马等1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人口约

500万。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日之江苏省连云港市陇海铁路以北的赣榆区、海州区、东海县和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莒县;临沂市河东区、郯城县、临沭县、莒南县;青岛市胶济路以南的高密县、胶州市、胶南县、诸城县。

滨海区北有五莲山区,南有甲子山区,中间横贯泰(安)——石(臼所)公路,将全区分割为滨北、滨南(或称路北、路南)两大区域。海(州)青(岛)公路连接苏鲁两省,为南北大通道。海岸线全长约400公里,南有连云港、北有青岛两大港口,中间由南向北依次有青口、海头、柘汪、岚山头、石臼所、灵山卫、红石崖等出海口。水陆交通十分便捷,我军有海上和陆路地下交通线连接华中、苏北和渤海、清河抗日根据地。

滨海区山海相依,河流纵横,平原广阔,滩涂无垠,自然条件好,农副产品丰富。山区盛产地瓜、花生、玉米、高粱;平原稻麦两熟,粮油富足;沿海盛产鱼虾,尤其海盐,畅销苏鲁豫皖诸省,税收颇丰。抗日战争以前,滨海区,特别是沿海各县,久享渔盐之利,实为鱼米之乡,人民生活殷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滨海地区的共产党员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活动基地,团结各地方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仇敌忾,积极抗战。1938年7月,共产党、八路军开始创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举办抗日骨干训练



班,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干部,提供了组织保障。1938年8月,中共鲁东南特委成立,在大力发展党员的基础上,先后领导建立诸城、日照县委和赣榆工委。原行政区划属江苏省的赣榆县因为党组织划归鲁东南特委,行政上也同时归属山东领导,此后直至1953年1月,始划归江苏。鲁东南特委确定大力发展抗日武装,扩展和创建根据地的方针,随后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迅速在莒县、日照、诸城、高密、胶县、赣榆等县展开。

1940年初,八路军第115师东进支队在开辟鄆马平原后,向滨海南部进军,7月21日东跨沭河,进至赣榆以西,开辟了临沂、鄆城、赣榆之间的广大新区,打开了从鲁南向滨海发展的通道。随后,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第九支队改编的山东纵队第二旅也开进滨海,横扫盘踞在赣榆的日、伪、顽、匪,相继建立临沭(初称鄆东北办事处)、莒县、日照、临沂、赣榆、沐水等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12月,莒县、临沂、日照、赣榆四县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四县联合办事处,即滨海办事处。至此,滨海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自1940年下半年,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部和主力686团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部在沂蒙山区汇合后,三大机关驻在一起,目标太大,加之沂蒙山区经济落后,抗战以来,日、伪、顽“扫荡”袭扰不断,我军三大机关和主力部队数万人拥挤在贫瘠穷困的沂蒙山区,斗争形势严峻,衣食难以为继。于是陈、罗首长认为,从长远打算,第115师及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需要设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有较好物质条件的具备战略发展的根据地内,以便更好地指挥全局。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定滨海区,一是滨海区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二是经济相对发达,利于养兵就食;三是交通便捷,沿海港口可南连华中,北接胶东;四是滨海区属苏鲁两省交界地带,周边虽然有敌重兵驻守,但驻连云港、日照、临沂、青岛的日伪军建制、指挥互不统属,有利于我军活动。1941年3月6日,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和山东分局东渡沂、沭河,进驻滨海区。从这时起直至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第115师师部和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绝大部分时间驻在滨海

区。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驻赣榆、临沭、沐水县一带;1943年至1945年9月驻莒南县。滨海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115师进驻赣榆一带后,为了扩大滨海根据地,打破日军海上封锁,打通与华中等地的联系,决定由115师教导二旅和山东纵队二旅一部,向陇海铁路终点连云港附近的伪赣榆县政府驻地青口及沿海地区发动攻势。1941年3月19日,青口战役打响,历时六天,我军取得东进滨海以来首次大捷,歼灭敌伪16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我军急需的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收复了从柘汪到下口之间的海岸线和大片地区,打通了从海上与华中及胶东等地的联系,并为我发展海上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巩固了滨海抗日根据地,为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相对稳定地驻在滨海区打下了基础。

1942年3月,鲁中第五(即鲁东南)地委与第四(即沭海)地委合并为滨海地委,直属山东分局领导,王众音任书记,王永福任副书记,孙汉卿任组织部长,李均任宣传部长,崔介任政府党团书记。赣榆县党组织隶属滨海地委领导。同日,成立滨海专署,谢辉任专员,崔介任副专员。同时成立滨海军分区,何以祥任军分区司令员,王叙坤任政委。1943年3月,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滨海地委升格为区党委,同时成立滨海军区。第115师教导二旅政委符竹庭调任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第115师参谋长陈丕桢调任滨海军区司令员。滨海区党委下辖滨北、滨中、滨南三个地委;滨海军区下辖三个军分区。第一分区(滨北)辖莒北、日北、诸城、胶南、五莲等五个县,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刘西元(后张彦),参谋长黎有章;第二军分区(滨中)辖莒中、鄆马、海陵、临沂、临沭等五县,司令员王建清,政委谷牧,参谋长王晓;第三军分区(滨南)辖赣榆、日照、莒南、沐水、新海连五县市,司令员王德贵,政委田海山,参谋长何以祥。至此,滨海区正式形成,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五大战略区之一。

(作者单位:赣榆史志办)

责任编辑 邱仕明



万毅避难

西朱范

王晓华

1940年9月,国民党第57军军长缪激流与日军秘密签订协定,被该军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两位中共特别党员仗义锄奸,并于9月22日通电全国,提出“锄奸救国”的口号,震惊全国。这一事件,史称“九·二二锄奸”运动。

群魔乱舞 常万师四面楚歌

“九·二二锄奸”事件的爆发,犹如平地惊雷,不仅给日军“以华制华”政策、南京傀儡政府以致命打击,而且极大震撼了国民党顽固派集团。他们从各自的政治利益出发,纷纷不择手段地对111师实施疯狂反扑。111师顿时陷入四面楚歌、虎视狼窥的危险境地。

锄奸过程中,由于112师667团1营营长韩子嘉临阵叛变,致使军长缪激流一伙逆贼窜逃。在112师防地,自知通敌叛国罪行一旦事发,必将得到严惩的缪激流,恶人先告状,立即向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发申报,大肆宣扬万毅就是共产党,常恩多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九·二二”事件就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政治阴谋,自己反而成了受害者。

于学忠收到缪的申报,不辨是非曲直,当即去电斥责常恩多。常恩多看到于的申文,愤满异常,遂详细向于学忠阐明了缪腐化贪污、消极抗战、通敌叛国及抓捕过程等事实真相。

于学忠是跟从张学良将军多年的老部下,一贯忠于张学良将军及其八项主张,颇有正义感,加上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和消极抗战,看了常的申文后,方了解事件原委。对111师的“九·二二锄奸”行动没有过多责难,但为平衡各方反应,于学忠仍于

9月27日,再次致电常恩多:“本部派参谋长高仁绂、高参张佩文,拟二十九日前往。”整个申文只字不提锄奸功绩,却倒隐含着希望常恩多配合调查的意图。

兔死狐悲。常、万二人的义举,使112师334旅旅长荣子恒及该师政训人员惶恐万状,惴惴不安。他们匆忙清理部队,安插自己的亲信,把爱国军官视为“危险分子”,大肆逮捕。

战区政训处主任、中将特务周复,更是紧相呼应,一口否定“九·二二锄奸”运动的功绩。他不仅颠倒黑白向上呈报,而且唆使战区总部的国特分子,竭尽全力封锁锄奸消息。亲日派何应钦闻讯,亦数次致电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明确表态支持通敌叛逆缪激流。

锄奸后短短数日,日军、汪伪、蒋顽、国特等多方黑暗势力心怀歹毒,反扑接踵而至。一时,111师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蒋顽阴谋 万毅中计陷囹圄

在这四面环攻的恶劣形势下,常恩多、万毅仍高举抗战旗帜,愤而雄起,提出“要从本身加强团结,集中一切力量争取军事胜利,用杀敌的军事胜利来保证锄奸斗争的政治胜利”,随即开展了军事攻势。由万毅指挥的大店战役、331旅662团新任团长孙立基指挥的碑庵战役及冬水店子之战,均取得丰硕战果。

常恩多、万毅的浴血奋战,未能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谅解”。1940年11月11日,蒋介石发来指责常恩多的电报一语道破,锄奸有罪、投降



有功。蒋介石对万毅很忌恨,一是由于西安事变中,万毅是有名的少壮派;二是因为在 1936 年,时任东北军团长的万毅在纪念“九一八”游行时打讨国民党一个少校政训员,蒋介石认为很反动。

在这种恶劣形势下,111 师内部矛盾愈发激化。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人,开始密谋策划架空常恩多、逮捕万毅的政治阴谋。1941 年 1 月下旬,三人向常提出“请师长带一营人到山里静养”的建议,以达到他们独揽大权进行反共的目的,被常愤然拒绝。诡计没有得逞,他们又瞒着常恩多,私自下达“加强戒备,防止袭扰”的命令,彻底隔断了 111 师与八路军之间的联系。

1941 年 2 月中旬,继前两次电报之后,蒋介石又亲自发来电报,内容仍是:肃清共产党,消灭八路军。陶景奎收到电报后,下定决心先逮捕万毅,除掉常恩多这支臂膀,然后再发动全面反共。

1941 年 2 月 16 日下午,万毅接到师部“速来师部研究 333 旅防务”的电报。17 日一大早,万毅骑马来到距大店四十多里的师部驻地。开完会后,孙焕彩以请吃便饭之名,摆了“鸿门宴”,趁机下了万毅的枪,把他关押起来。万毅被关押的当晚,陶景奎就给予学忠总部发去电报,谎称“万毅因病请调附员”。次日,于学忠复电照准。

扣押万毅得手,陶、孙、刘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提出“为保存本师生命的延续,清除左倾分子”的反动口号,按照早已拟好的名单,开始大逮捕。一时,111 师驻地狼烟四起,杀机重重。中共东北军 111 师地下“工委”的曹建华、张苏平被扣;抗敌演剧第六队和师战时服务团团员全部被关押;师部电台台长李政宣夫妇被逮捕;在师工兵营工作的翟仲禹等七名同志被监禁;333 旅军士队被强行解散……这就是 111 师的“二·一七”反革命事件。

1941 年底,陶景奎请示战区总部同意,又将万毅解送战区总部,关进塘山后的军人监狱。

杀机四伏 多方施救憾未果

万毅被捕,面临险境,引起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的密切关注。为救万毅,山东分局、111 师地下“工委”及常恩多本人,不遗余力展开了营救行动。

在 1941 年 2 月万毅被关押之前,山东分局派江华与代理 111 师师部秘书并主持地下“工委”

工作的华诚一秘密见面,了解情况。考虑到万毅处境危险,华诚一建议,请求山东分局将万毅的地下特别党员关系,转到 111 师地下“工委”来,以便研究对策,适时予以反击。江华表示同意并立即发报请示山东分局。不料,因日军大扫荡,分局机关正在转移,整整联系了一夜,电台始终没有接通。华诚一不敢久留,只得次日返回师部。因这次的讯息不畅,致使万毅错失脱险良机,陷入狼窝虎口。

“二·一七”事件后,1941 年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申山东分局,指示:“查明万毅及其他被扣同志下落,并尽力设法营救,将已暴露同志及进步分子紧急撤退。”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亲自派分局负责东北军工作的谷牧带领一个连靠近 111 师驻地,了解万毅及其他同志和进步分子的下落,伺机将他们救出。但由于万毅被关押在总部军人监狱,戒备森严,无法派人进入。

在得知万毅被转到总部监狱时,病情日益加重的常恩多忧愤地说:“万顷波(万毅号)战功显著,锄奸坚决,把他送到总部关押,这不是给汉奸缪激流出气吗?我一定把他要回来!”常恩多不止一次要求于学忠释放万毅,但于学忠迫于蒋介石压力,未敢决断。他后来又通讨总部秘书兼政务处长的郭维城(中共党员),打听万毅在总部囚居的境况。并含泪对郭说:“我对不起顷波,叫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告诉于总司令,就拿我这个中将师长也保不出他来吗?”

1942 年 4 月,于学忠收到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紧急密申,申文是:“奉总裁谕,万毅通敌叛国,着即就地秘密处决,具报。”于学忠看讨申文后,左右为难,他深知万毅是东北军中一位抗战有功的青年将领,在部队、地方都颇有影响,不经公开审判就秘密处决,难以服众。再则,现在总部在 111 师的防区,就是常恩多这一关都不会通讨。临了,他让参谋长王静轩去征求常恩多的意见。

第二天,常恩多看王静轩送来的申文,愤怒地从病床上一跃而起,大声吼道:“这不是处决万毅,这是镇压每一个杀敌锄奸有功的人!万毅是我的部下,他没有罪!要杀,就先杀我常恩多!就先解散百十一师!”常恩多的态度,让于学忠更加犹豫不决,加之郭维城又在一旁竭力劝告,于学忠最终下定决心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回电称:“委座:来电悉。查万毅在抗战期间作战勇敢,杀敌锄奸,屡建功



勋,并无通敌之嫌,所令碍难执行。”

常恩多得知这个消息,安慰了不少。他已感知自己居世无多,只盼望万毅尽早出狱,来领导 111 师。3 月 8 日,他挥笔写下了“一点尚存天假我,百年事业待盟申”诗句,表达了他对万毅的关心与厚望。

九死一生 万毅避难西朱范

1942 年 7 月,蒋介石对于学忠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处决万毅,十分恼火,随即又发来电报催促:“万毅通敌叛国,确有实据,着即秘密处决,否则以违令治罪。”并派中将特务周复,从重庆赶回鲁苏战区,监斩万毅。

周复一到战区,态度极为蛮横,指责于学忠包庇共产党,违抗委员长命令,不忠于党国,被于学忠摔杯轰走。为好收场下台,周复只好依照于的意见,进行军法审讯。1942 年 7 月下旬,开始一审。军事法庭设在战区总部驻地李家采。主审由总部军法副分监李文元担任,陪审由 111 师军法处代处长侯小鲁担任。给万毅罗列的罪名有三条:(一)通敌;(二)“双十二”从犯;(三)奸党嫌疑。李文元代表法庭对万毅一一质询。站在被告席上的万毅,对上述三条罪名,大义凛然,铿锵犀利地逐一据理予以驳斥。

8 月 2 日,再次对万毅进行二次审判,罪名如昨。万毅最后的陈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既欲杀我,何用那些假证,又何必采取这种形式呢?”李文元被弄得尴尬被动,只好草草收场。

同天中午,常恩多约郭维城见面,意识到合法营救万毅已是不可能,决定采取非常的手段和组织起义来解决。这时的常恩多已三天未进米食,气力消耗殆尽。他对郭说:“我们还有办法,有决心,逮捕坏蛋们,把部队拉到解放区去!”随后,以全身气力艰难写下了他一生最后的 35 个字: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卿公主张,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八·二。

2 日傍晚,为避免国民党特务跟踪,郭维城携夫人装作去看望机要科王科长,来到关押万毅的监狱,顺利见到万毅。郭对万交待,说常要起事,到时会派刘副官带骑兵来接。让万不要误会,来人会从西南面小门进来。

对郭维城所说的,让万毅等待 111 师起事后营救他的想法,万毅有着自己的考虑:国民党反动派

对他连续两次审讯,罪名离奇,罪状升级,这是危险的信号;再说常恩多一旦故去,郭维城举事能否成功,骑兵能否顺利将他救出,都是疑问。之前,万毅就有越狱脱险的打算和准备。曾暗暗对监狱周围的地形、地物仔细观察过。他发现,监狱的围墙虽高,但有斜坡。特别是墙脚处长着一架葡萄秧,藤粗叶繁,且一直顺墙而攀。葡萄秧后面的隐蔽处,就是厕所,越狱条件比较成熟。事不宜迟,万毅当机立断,决定越狱。

8 月 2 日夜 11 时,万毅趁正拉痢疾不断上厕所之机,扯着葡萄藤翻过围墙,按他事先谋划好的方向,一直向西。几经周折,终于在 8 月 3 日上午,到达山东莒南县的车峪,车峪是山东纵队 2 旅 3 团的驻地。团政委王建青接待了万毅。4 日,中共分局派人把万毅接到三界首,和分局来的谷牧会合。

8 月 5 日,万毅随谷牧一行来到山东分局驻地东海县西朱范村(原属临沭县管辖),受到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当晚,朱瑞召开分局会议,听取万毅个人及曹诚楷、王振乾关于 111 师“八·三”事变(因万毅的越狱,常、郭将起义提前至 8 月 3 日)的汇报。

8 月 9 日,当朱瑞、万毅赶到 111 师师部驻地王家坊接应时,常恩多已不幸去世,起义部队两千余人被带回我滨海根据地休整。

起义后的 111 师,经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批准,番号不变。通过民主选举,万毅担任新编 111 师师长,郭维城担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这支起义部队随后参加了攻打甲子山的战斗,并取得重大胜利。

1944 年 10 月 20 日,奉山东军区命令,新 111 师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支队长。自此,万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奔赴各大战场,驱逐倭寇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名战功卓著、声名显赫的军事巨将。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单位:东海县开发区北区南辰管委会)

责任编辑 于冰清



云台上的丰碑

——抗日石刻与连云港保卫战(上)

李彬

巍峨连绵的云台山像一条蜿蜒的巨龙屹立于黄海之滨、海州湾畔,青山叠翠,碧海涌波。然而七十多年前,这里却发生了一场壮烈的连云港保卫战,前后历时逾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守军以顽强的斗志和满腔爱国情怀,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日寇疯狂的进攻,捍卫了中国军队和中华儿女的尊严,牵制了日寇在苏北乃至全国战局的进展,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直至今日,云台山地区仍保存着不少当年中国抗战守军留下的石刻,这些石刻都是见证这一段悲壮历史最好的实物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史料记载,当年守卫连云港的中国守军共有6支,分别来自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和地方改编的武装。他们分别是国民革命军第7军、第31军、第40军、第57军、游击第8军和第89军。其中第40军、第57军与游击第8军分别在云台山区域留下了不少抗日石刻,而第7军、第31军与第89军并没有留下抗日石刻,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三支军队在连云港保卫战中所作出的贡献。长期以来,地方学人对这段历史已多有涉及,并做了一定的研究,但整体而言不够全面和深入。现试以史料为基础,结合云台山抗日石刻实物资料,对参加连云港保卫战的各支部队和连云港保卫战情况作进一步探讨。

一、国民革命军第7军

(一)国民革命军第7军沿革

国民革命军第7军是国民党桂系嫡系部队,抗战之前曾参加讨统一广西、滇桂战争、北伐战争、宁

汉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战争,是桂系军阀的起家部队,有“钢军”之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桂系首领李宗仁与白崇禧将所部桂系部队改编为三个军,除了原有的第7军,又将第15军改编为48军,加上新组建的31军,组成第11集团军,由李品仙任总司令率领北上参战。廖磊的第7军于1937年8月初前往海州驻防,同年10月中旬,廖磊升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所部调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由周祖晃接任第7军军长,在淞沪会战中给日军以重创,而廖磊部副师长夏国璋、旅长秦霖、庞汉桢等将领也相继英勇殉国,付出惨重的代价。随后第7军由张淦、徐启明相继任军长,参加了黄广会战、随枣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以及豫西、鄂北会战等战役。在解放战争中,钟纪与李本一相继任该军军长,不断制造摩擦,曾多次与共产党部队发生激战,1949年12月在广西战役中被我军全部消灭。

(二)第7军连云港抗战概况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25日,日本发表所谓“遮断航行”宣言,封锁我国全部领海,逐步侵占华北,并挥师南下,连云港亦不断遭受日寇海军舰队的骚扰,局势越发紧张。当时海州地区的唯一驻军是财政部的税警总团,但税警总团已在海州集结待命,准备参加淞沪会战。8月1日,桂系的第7军接到命令,在军长廖磊的带领下从广西柳州步行到衡阳,转乘火车至海州,担任守



卫连云港沿海之责,军部驻海州车站,共辖3个师,第170师驻新浦、171师驻连云港、172师驻赣榆。9月9日,连云港外发现敌巡洋舰一艘游戈。9月10日,连云港外60华里海面,敌航母以探照灯向我海面照射,东连岛守军以望远镜发现敌机6架。9月11日,敌一架侦察机飞临东海、新浦、墟沟上空盘旋。此时,连云港外共有敌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3艘、巡洋舰2艘,肆意在鹰游门海域游弋,迫使国民党当局封锁港口。9月12日,石臼所海面停泊日军航母1艘,舰艇4艘,以车牛山为根据地,搜查焚毁我民船,无恶不作,海州青岛间航路遂告中断。9月13日,距连云港70华里发现敌鱼雷艇一艘,与此同时,停泊在车牛山岛之敌方巡洋舰讲至距连云港20里处试探测量,我军也进一步加强防范。9月15日,敌舰停泊车牛山,并修复平山岛灯塔。9月20日,10架敌机飞至连云港上方投弹。9月21日午后1时,12架敌机又飞至连云港上空投弹20余枚,码头、货场、车站悉数被炸,十余名路工受伤,情报所长及数名士兵殉难。9月22日,敌舰向我岸上发炮,并派陆战队分乘数十艘小艇,企图登陆,被我守军击退。9月23日,敌舰掩护汽艇欲登陆墟沟,我军以大炮予以反击。在此期间,日寇尚未大规模登陆,双方基本维持小规模战事。10月中旬第7军开往上海参战。

二、国民革命军第31军

(一)国民革命军第31军沿革

国民革命军第31军系桂系新组建的部队。卢沟桥事变后,为北上抗日之需要,国民政府以第173师、第174师与第135师在南宁合编为第19军,不久后,改称第31军,由刘峙任军长。1937年8月,该军由南宁会师北上进驻徐州,隶属李品仙第11集团军,同年10月,第7军南下上海参战。第31军填防海州,并纳入第5战区序列。是年12月中旬,首都南京沦陷,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组织津浦路防御战,31军被调往津浦路南段明光一带据险防守。刘峙部与日军激战月余,未分胜负,又在明光设计将日军截成数段,围歼孤立之敌。1938年2月,军长刘峙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次长,由韦云淞接任第7军军长。1938年5月,该军参加徐州会战,担任淮河北岸布防,抗击

北进日军。徐州会战后,又奉命移师武汉,隶属第5战区第21集团军廖磊部。1938年8月,参加了武汉会战,武汉会战结束后,该军调往广西桂林讲行整训。后陆续参加桂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桂柳会战等战役,1945年4月被裁减。

(二)第31军连云港保卫战状况

1937年10月中旬,第31军移防海州。10月15日,日军在舰艇、飞机掩护下,欲登陆海防重镇墟沟,被炮火击退。10月22日,敌机再次飞临连云港上空,轰炸码头、仓库及陇海站大楼。11月21日,日军强行在连云港登陆,形势一度紧张,31军立即赶到,奋力还击,驱回登陆之敌。11月25日,又有敌舰在连云港海域放下三四只汽艇,在西连岛附近窥视。12月3日晚,日军向岸上开炮,企图掩护陆战队登陆,经第31军猛烈还击后,即行退去。此时,敌军在占领连云港外围的车牛山与平山岛后,进而强登我东西连岛,修筑工事,派舰艇在墟沟、大浦一带海域窥视,对我连云港虎视眈眈。南京沦陷后,31军离开连云港,奉调津浦路南段,换防交第40军廖炳勋部。

三、国民革命军第40军

(一)国民革命军第40军沿革

国民革命军第40军是西北军旧部,军长廖炳勋,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宿将,1931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被张学良改编,廖炳勋被编为步兵第1师。同年秋扩编为第40军,名义上是军,实际上参战的只有一个39师,辖115、116两个旅,每旅各辖两个团,另外有一个补充团直属师部。一军仅有5个团的兵力,且装备落后,这种高编寡兵的政策是国民党对待杂牌军队惯用的伎俩。1933年,廖炳勋主动请缨参加长城抗战,后与红军发生摩擦。西安事变后,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七七事变后,廖炳勋部北上支援平津抗战。1937年9月,在守卫沧州的战役中,虽给日军以重大伤亡,但自身伤亡也非常惨重,被迫撤出战斗,并移师碭山休整。1937年10月,划归第5战区。同年12月中旬移师海州接防。1938年2月初调防鲁南,陆续参加了莒县保卫战与临沂保卫战。直到1939年3月,106师划归第40军,至此第40军才结束长期以来仅辖一个师的局面。同年9月扩编为第24集团军,廖炳勋



为总司令。1943年4月,在太行山区被日伪包围,第40军军长马法五突围,总司令庞炳勋投敌。

(二)第40军连云港保卫战概况

第40军驻守连云港后,军部驻海州,115旅驻连云港、116旅驻新浦。115旅朱家麟旅长率领229团与230团对连云港港口实行严密地封锁。是时,日舰在海面上肆意游弋,并经常派遣飞机轰炸地面目标,只作试探性骚扰,始终未敢轻易登陆。第五战区及时补足第40军的军械,使军队士气大振。12月25日,日军悍然向悬挂荷兰国旗的荷兰治港公司办公楼投弹三枚,致该公司办公楼全部被毁。次年2月初,40军奉令撤离连云港奉调鲁南,溃防交于第57军112师。

(三)第40军邵恩三题刻



飞来石邵恩三题刻

在云台山飞来石上,有一方40军团长邵恩三的题刻。刻文为:“国难当头,吾辈军人当以死赴之;得不死,则亦得后天下之乐而乐也。邵恩三。”从

碑文中的豪言壮语来看,邵恩三将军是一位极具爱国情怀的将领,为了保卫国土,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在之后的抗战中,邵恩三将军也确实做到了这些,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而英勇殉国。

邵恩三(1904—1943),河北省清苑县人,第16混成旅(冯玉祥部)学兵第二期毕业,时任国民党第40军39师115旅229团团长。在守卫云台山期间,对日寇讲犯连云港的嚣张气焰,邵恩三将军义愤填膺,以一腔热血在云台山上留下了这方爱国石刻。这也是第40军将士在云台山地区留下的唯一一块石刻。1938年2月初,由于战争局势的需要,第5战区将第40军由连云港调驻莒城,2月22日,日军板垣师团由诸城南进,直扑莒县。2月23日,日军精锐机械化部队三千余人,并战车四十余辆,包围莒城东、北、西三面,而我军守城部队仅千余。邵恩三亲率十兵,居高临下,以手榴弹齐掷敌阵,击退日寇疯狂的进攻。24日晨4时,日寇以增援部队强攻三次,邵恩三左臂受伤,仍坚持指挥。此战共毙敌40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莒县保卫战是第40军的辉煌之战,以至于敌酋板垣征四郎也不得不感慨日军最优秀的部队竟然败于中国杂牌军之手,引以为巨耻,欲剖腹自杀而未遂。这场战役对于阻敌南下、争取我军部署之机,从而取得日后的临沂大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后115旅突围调驻临沂,邵恩三所部又参加了著名的临沂保卫战。1943年4月11日,第40军扩编为第24集团军,邵恩三升任第24集团军少将处长,部队在太行山与日军激战中伤亡4000余人,并在山西垣曲被日伪部队包围,先期投降日寇的孙殿英奉令上山搜寻庞炳勋,并派人诱降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当伪军包围庞部所驻山洞,即向洞口扑来,几名抵抗的士兵被当场打死,并在洞口向洞内喊话,让洞内人投降。这时,洞内传来一声枪响,原来是邵恩三将军不甘做敌人的俘虏,在山洞内悲愤自戕,壮烈殉国。享年40岁。(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港口集团东联公司)

责任编辑 邱仕明



令,限你三天之内到任,否则,你全家都得死!”

迫于无奈,父亲只能带领一家人返回塘沟。这时,我家在塘沟东大街的住宅已被日本人抢占,我们只能在塘沟北街北面周二爷家租了几间房子,临时住了下来。

西墅乡公所设在院前村,那里配有一名“乡丁”,我父亲从来没有到乡公所去过,有事就由这名“乡丁”到我家来报告一声。其中有两件事是我难以忘却的:有一次,“乡丁”捆绑一个人送到我家里,说是扒铁路的,父亲审问一番,当场就把此人放了。还有一次,“乡丁”来报告说,三天之后,日军要到西墅乡来征粮,凡抗交粮食的,格杀勿论。父亲问清日本人要我们西墅乡交多少粮食,然后就告诉“乡丁”,在日本人下乡之前,先到我家来把粮食取走,省得让日本人挨家挨户去收了。其实,父亲交出去的粮食,就是我们一家人冬春季的口粮啊。结果我们一家人挨饿,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就这样,日本鬼子对我父亲的工作还是很不满意,经常在大会小会上指责他,说西墅乡的工作做的很不好,还派了大批便衣特务到西墅乡查访。

身陷囹圄绝食以明志

194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驻扎在新浦的日本宪兵队穷凶极恶的闯进我家,把我家里的箱箱柜柜翻了个底朝天,并且把我父亲绑走了,同时,还抓走了房东周二爷。他可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完全是受了我父亲的牵连。

父亲被抓走之后,母亲每天都到宪兵队大门口,从早坐到晚,总想打听一点有关父亲的消息,直到第11天上午,宪兵队传出话来,说我父亲已送到海州教会医院,叫我们家赶快去人。

我们家经过商量,觉得我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不能去,怕鬼子找借口再把哥哥、姐姐扣起来,于是就决定由祖母、母亲带着我一起去。就在这天下午,我们三代人来到了父亲“病房”,这时我父亲已经双目失明,头上缠着白纱布,揭开被子一看,遍体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些血痕已经干的像鱼鳞一样……母亲禁不住放声哭了起来。这时,我祖母很坚强的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快去找点热水来,给他擦擦身子,换换衣服。”

母亲一边替父亲擦身子,一边小声的问:“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抓你呀?”其实,这时候父亲嘴唇已干的掉皮,舌头也动弹不了,只是鼓足劲,从喉咙里断

断续的吐出几个字:“他们……说我……通八路。”还用手指做了一个“八”字形。没想到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就停止了呼吸,时年42岁。

日本投降后,释放回来的周二爷告诉我们,父亲被抓到日本宪兵队,一下囚车就被押进审讯室。拖回牢房时已经人肉模糊,不省人事了,从此,他就以绝食表示抗议,不吃不喝,直到生命垂危时。同牢房的人再三要求日本人送他去医院治疗,就在日本鬼子送我父亲去医院临上车时,还让狼狗冲过去撕咬他,他们根本就不想让他活啊!

为了把父亲遗体运回家,我们就地买了一口薄皮棺材,当时西墅乡知道这个噩耗的人,都悄悄到我家来看望。有一位不知名的先生还把自家门前的大树砍了,带几位木工前来为我父亲做了一个套棺。还有一位乡士主动送给我们一块“风水宝地”,坐落在塘沟北固山上,其用意就是让我父亲永远留在西墅乡。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发努力

我父亲走了,我们家也就散了。大姐、二姐分别雇给人家带孩子、做家务,大哥到外地做零工,二哥求得亲戚帮扶到外地读书。我和母亲因为交不起房租只能住到山上的草房子里,有时,就在家边周围开点小荒地,到山上打打柴。

终于等到了日本鬼子投降,家乡得到解放。我们又住回了塘沟东街老宅,哥哥姐姐们也都陆续回家了,他(她)们先后组建了家庭,生儿育女,过上了安定舒适的生活,我又重新回学校读书,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共青团支部书记,工作后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我是江苏省总工会机关的一名退休干部,享受着幸福晚年。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我父亲的第四代孙子、孙女们,更加努力向上,他们中有博士生、硕士生15名,有的人还是国家尖端项目的科研人才。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说说这些心里话,一是表达我对那些为抗日战争流血牺牲的英雄们的怀念和敬意,同时,也是真诚地希望国人不要忘记历史,要热爱祖国,紧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江苏省总工会)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二)

(1939.3—1940.12)

本刊编辑部

1939 年

3 月

1 日,日本侵略军第 5 师团第 21 联队在海军第四舰队、空军第七飞行团配合下在灌河口登陆,侵占了淮北盐集散转运地燕尾港、陈家港。

2 日上午,日军第 21 联队先遣队侵占大伊山。4 日,占领板浦。3 日,另一路日军从埭子口登陆,4 日上午侵占南城。

4 日上午,日军第 114 师团的步兵 1 个大队,第 21 师团的步兵 1 个大队及第 5 师团的第 21 联队攻占了海州城。与此同时,从山东临沂南犯的日军占领了新浦、连云港。

东灌沐抗日游击总指挥部在原民众抗日自卫队的基础上于汤沟宣布成立,汤曙红任总指挥。

驻大伊山日军扫荡东海县西圩(今属沐阳县),东西圩联庄会奋力抵抗。汤曙红率领自卫队赶赴增援,里外夹击,毙敌 20 多人,迫使日军撤回大伊山。

春 灌云

县成立第三游击大队,孙笃牛任大队长,原国民党灌一区区队长带来一个区队,编为游击大队第一中队,胡灏任中队长;原基干队编为第二中队,武永嘉任中队长。

4 月

10 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东灌沐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赣海南游游击支队第三团,



1939 年 3 月 4 日,海州城沦陷。图为侵华日军从海州东门入城。图片由李彬提供



原总指挥汤曙红任团长,张克辛任副团长,周瑞迎任政委。下辖 4 个营,约 1100 余人。

中共鲁东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莒(县)赣(榆)临(沂)边区工委,书记白炎波。下辖赣榆五区(书记张树仁)、六区(书记陶君彦)。

6 月

月初 日军在张店南边义泽河上架一木桥。该桥是从伊山往新安镇的必经之路,日军筑两个碉堡守卫。南讲支队三团团长汤曙红率队炸了木桥。

7 月

8 日上午,南讲支队第三团组织 80 名指战员在五里槐伏击日军汽艇,将其拖船打翻,毙伤日军 30 余人,三团声威大振。

东灌沭 3 县各界人士在汤沟成立青年救国总团,孙若溪、厉国桢、李运涌、汤牛济、汤化愚、汤增桐、冯化等 7 人当选为委员。

17 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队 3 团团长汤曙红在汤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史称“汤沟事件”)。

赣榆青年救国团成立,团长李克济。

8 月

13 日凌晨,数百名日伪军突然包围灌云县南城镇(现属海州区),逮捕并枪杀了群众武同富等 17 人。

17 日,日军出动坦克、装甲车 9 辆从新浦开进沙河据点,进攻赣榆。赣榆县长朱爱周指挥县常备总队迎击日军于黄圈(今为东海县黄川镇),激战竟日,双方互有伤亡。县常备总队随即撤到赣榆北部。

夏 国民党在东海、赣榆边区组建东赣边区游击队。

9 月

中共鲁南四地委成立,辖临沂、郯城、邳县和赣榆、东海一带,命明任书记(未到职),许言代理书记兼宣传部长。

中共中央决定将陇海铁路以南地区划归中原局领导。

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成立苏皖纵队,任命江华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将原在苏皖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讲游击支队改名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讲支队(简称“苏纵南支”)。

中共海属中心县委改为苏皖二地委,杨绅任书记。

11 月

29 日,日军数百人包围赣榆县岗庄湖(今属东

海县),放毒瓦斯将 81 名无辜群众毒死。

国民党赣榆县常备旅在莒南县朱家泮村成立,县长朱爱周任旅长,共产党员刘寄萍任政训主任。

1940 年

1 月

中共苏皖二地委决定在所属地区分别成立 4 个县:宿北为第一县委,书记王亚东;沭阳西部二、三、四区与东海南部为第二县委,书记钱天素;沭阳东部为第三县委,书记夏炳桂(夏岩);灌云为第四县委,书记吴书。

2 月

东海县抗日武装云台大队在竹墩、双店一带成立,钱霖任大队长。3 月,在郯城雁圈被编入十力——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讲游击支队第九大队,钱霖任大队长,刘锡九任政委,王涌吾为参谋长,宋耀南为政治处主任。

3 月

12 日,国民党赣榆常备旅第二团第三营营长李从林在范庄率全营官兵参加八路军东讲支队。

22 日,朱爱周率赣榆常备旅在韦家岭遭日军围击,朱爱周身负重伤,壮烈殉国。参谋长乔金亭阵亡。

春 汪伪政府于板浦成立淮海保安司令部,委任李实甫为保安司令。

5 月

20 日,日军屠杀赣榆第 6 区龙王庙集平民百余人。

7 月

经中共鲁南五地委同意,中共赣榆工委除原工委班子外,于月初又组建一套工委班子,书记张树仁。

18 日,临(沂)郯(城)赣(榆)东(海)4 县边区游击支队成立,朱明远、张树仁为正副司令员。

29 日,临(沂)、郯(城)、赣(榆)、(东)海、邳(县)5 县参议员及各界代表 300 余人召开大会,成立鲁南参议分会与鲁南专署第一行署,公推张向三为参议长,王永福为副参议长,张策平为行署主任。

下旬 日军突袭赣榆殷庄东北小官庄,枪杀村民 20 余人。

是月 黄克诚率八路军第 4 纵队第 2 旅第 7 团抵达皖东北,与皖东北的苏鲁豫支陇海南讲游击支队及新四军第 6 支队第 4 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 5 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是月 汪税警总团派马儒学到海州组建税警海州分团,并委任马为少将分团长。

8月

13日,八路军东进支队第二大队(第115师教导第5旅第13团)进入赣榆,袭击驻马朱孟、三角汪等地伪军。

中旬 八路军第5纵队一支队由皖东北强渡运河,进入淮海区。先后建立泗阳、淮阴、沐阳、东海、灌云、涟水等县政权。

28日,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汤圩宣布成立,孙笃生(民主人十)为首任县长,汤若瑜任秘书(党内副书记)。县参议会同时建立,吴月波(后为冯季皋)任参议长。

中共沐宿海中心县委决定建立东海陇南区抗日政权,任命周晓江为区长。

八路军第5纵队进入淮海区,灌云县委即与其取得联系。根据要求,灌云县立即成立了游击大队配合主力开辟根据地,委任徐潜泰为大队长,孙良浩为政委,张紫扬为副大队长。

9月

8日,百余日军督率1营伪军,袭击陇海路北东安村。东海县进步人士杨凤鸣率区中队及民众武装300余人,奋起抗敌,与敌激战1天1夜,毙伤敌50余人,杨凤鸣次子庆禄及民兵6人英勇牺牲。

上旬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2旅进入滨海地区。

上中旬 中共苏皖区党委东渡运河到沐阳,驻六塘河岸钱集、陈圩子一带。决定撤销苏皖二、三地区,原属各县县委直属区党委领导。

18日,中共苏皖区党委通过了成立淮海区专员公署的决定,推选吴法宪为专员(后由金明代专员)。专署共辖涟水、淮阴、泗阳、东海、灌云、宿迁、沐宿海、涟灌阜等9个县级行政单位,计33个区。

冬 八路军第115师教导2旅第4团进入赣榆、东海一带。

10月

灌云县为拯救民族危亡,宣传抗日救国,创办了灌云县中学。县委委员孙存楼担任校长。1941年5月改称“边中”。1943年秋,更名为灌沭中学。

11月

24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2旅副旅长刘海涛率第2旅一部与“边支”突袭董毓珩保安旅驻地葛墩埠,保安旅第3团团长朱其藩率团部和4个连战场地起义,董毓珩率部逃至董家湾至荷庄湖一带,赣

榆县四、五、六区获得解放。

25日夜,伪剿共联盟军数百人窜进东海县南岗街(今属灌云县)。南岗周围的联庄会纷纷拿起武器予以合击,毙敌126名。

30日,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隶山东省滨海专署。朱明远任县长,李克济任秘书。县政府设在第八区探马庄。

30日,临郯赣东4县边区游击支队与起义的朱其藩部合编为山纵第2旅独立一团,朱其藩任团长。赣榆县惯匪张旱三(外号“黄泥头”)率全团宣布反董起义,所部编入山纵第2旅独立二团,张旱三任团长。不久张旱三叛变。

东海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前梁荡(今属灌云县)宣布成立,周晓江任县长,宋光壁(宋耀南)任秘书(不久为刘锡九)。

山纵第2旅派原“边支”管理员谢荣忠回赣榆建立赣榆县大队。不久,第四军分区派赵文清任大队长。

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的中共地下党员江潮率第667团部分官兵起义,被编为第57军补充团,成为抗日军队。

12月

15日,莒县临赣4县代表大会在莒南坪上召开,民主选举谢辉为4县联合办事处主任。

18日,东海县集中县直属武装和各区武装,配合张爱萍率领的新四军第9旅一部包围被顽东海县政府盘踞的湖东口一带,活捉顽县长庞寿锋和常备大队长丁同道,给反共顽固派以沉重打击。

22日,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撤销涟灌阜边区办事处,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合并后的部队仍沿用滨海大队的番号,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大队副孙良浩,政委吴书。

八路军第115师所属部队先后整编为7个教导旅。115师独立支队第一团、鲁南支队和苏鲁支队合编为教导2旅,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次年1月开赴滨海地区。

中共临赣工委成立,邱也民任书记,辖区包括临沂板泉崖及赣榆县,隶属鲁中区五地委领导。

(未完待续)



连云港商品集散地和海运枢纽港历史地位的形成

刘凤桂

连云港今天所具有的商品集散地和海运枢纽港的地位，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而形成的。

秦汉时期江苏海岸线在今海安—盐城—阜宁—板浦—海州—九里七一线，长江的出海口在海安。海安县属广陵国（东汉称郡，今扬州），越过长江便是属会稽郡的吴县（今苏州）。从东海郡朐县到会稽郡吴县水上交通有河、海两线。河是春秋时吴越北上开掘的邗沟（大运河的前身），邗沟与淮河、泗水相连，朐县达淮河的支流游水—涟水入淮河（参见郦道元《水经注·游水条》）讲邗沟越长江到吴县；海是从朐山或郁洲岛沿近岸海路过长江口而达吴县；陆上交通，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巡，上会稽山后，“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即回程经吴县（今苏州）从江乘（今江苏句容，南近镇江）渡长江，从今江苏扬中再沿海岸陆路北上经朐县至琅琊。自秦汉以后，古海州地区与江南的水陆交通基本不出这一水陆交通网络，而秦汉时的主要交通便利是陆路。

据《晋书·孙恩传》《宋书·高祖纪》等文献记载，东晋孙恩起义军于隆安五年（401）六月，从海岛（今舟山群岛）浮海讲至丹徒（今镇江东）威胁京师，因建康有备，转而北上破郁洲（今云台山）和广陵。此证今扬州与云台山之间有近岸海路可通，扬州与浙江舟山群岛亦有近岸海路可通。这应该是连云港与江浙之间最早的海事记录。

从连云港到今烟台港的北上海路，秦汉时期就存在。从《史记·封禅书》可知，战国至秦汉时齐燕一带的方士们经常“尝游海上”，出没于琅琊、东海两郡，讲述在海上看到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并称有仙药可得。徐福东渡，走的就是“从山东琅琊启航，北绕山东半岛成山头到达登州蓬莱，再经由庙岛群岛北渡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而前往朝鲜、日本的”（参见徐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这条航线的重要特点在于，各段航路都是沿着风浪较小的近岸海路航行，便于避风和补给。日本来华的交通，见《文献通考》：“倭人……初通中国实自辽东来。”即从北海道中到达马韩，沿着马韩的海岸顺各岛屿海湾北上，到达乐浪郡，取道辽东至建康。汉末魏晋之际，存在着一条从建康（今南京）沿近岸海路到朐县绕山东半岛、朝鲜半岛而到达日本的航线，此已被海州南门砖厂东汉二号墓出土的铜饰件与同时期的乐浪郡古坟出土的铜器的风格一致性所证实（参见《连云港港史》）。唐代文宗、武宗年间，日本请益僧圆仁在中国九年两个月，往返两次，选的都是这条航线北上，或去五台山学佛，或借道新罗岛（朝鲜半岛）回国，可见被史家所称这条“黄海北线”自秦汉至隋唐一直是从今连云港一带出发



的中国与东北亚海上交通的主要线路。

由此看来,秦汉至六朝,连云港已经具备:一、从洛阳向东至朐县、琅琊并由此向南至广陵及向北至登莱的东西和南北两条陆路交通线;二、从郁洲岛北上经琅琊(唐宋称密州,即今之青岛)至登州(今烟台)的近岸海路航线和南下经广陵(今扬州)跨长江口经会稽郡吴县(六朝时为吴郡,今苏州)到舟山(今浙江舟山市)的近岸海路航线这两条海路交通线;三、往南,从朐山通讨游水—泇水达淮河入邗江至吴县的内河航线。往北,到今东海县羽山西,往北经山东临沐县利成村入赣榆县境,经龙河乡盐仓城,走柘汪南入海。至于与中原地区的内河交通,因沂、沭两水和淮、泗贯通而达河(黄河)、济(济水)汴诸河。分析至此,可以得出结论:秦汉时期的连云港地区已具备了陆、海、内河三类交通条件,使它对内可以成为河、陆两运的商品集散地;对外可以成为海路交通的中间港、枢纽港。

唐宋时期,这一地理区位优势尤为突出。因两淮盐业兴盛,盐税成为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为了解决官府盐运(唐代实行政府盐业专卖),便于管理,打击私盐,早在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唐中央政府就拨款利用游水故道开挖了一条“官沟”(又称官河,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促进海州与南北内陆联系。原为漕河,主要便利沂州、密州、泗州等地漕米。南下,大体上以板浦为内河枢纽,运盐经泇水,入楚州(今淮安)顺大运河南下至当时的国际大都会扬州,回程将扬州的百货运至海州,再集散至北方各地;或经淮入泗达汴将淮盐运到中原,进入开封、中州、洛阳、长安等中枢地区。淮盐官销至这些地区的水道,民船在官府规定的月份也可以使用,从而便利了货物流通,漕运得以兴起。从宋代开始,漕运成为官方征税的一个重要来源。

正因为漕运的兴起,北宋时期海州与中原及南、北方地区的民间贸易蓬勃发展起来。当时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商品,有相当部分应该是通过海州港北上高丽、日本;南下通过扬州港集装上大船舶去明州(宁波)、泉州、交州(广州)诸港的。宋代海州因盐业官销和漕运、海运兴起而成为富庶地区之一。从海州南门砖厂五代—北宋墓葬群出土的邢窑白瓷、铜官窑瓷、越窑青瓷、

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白瓷、安徽繁昌窑影青瓷、耀州窑瓷、长沙窑瓷的执壶、茶盏、茶托、碗、盘、盂、枕、杯、观音头像等以及大村海清寺塔塔基出土的汝窑器看,当时海州几乎集中了全国各个著名窑口的精美产品。这些陶瓷生活器用,一是为当时民众所用,可见生活之富裕。二是作为出口商品。1986年新海电厂四期扩建工程开挖基础时,发现一处北宋时的码头遗迹,出土了大量上述瓷品的碎片,应该是货船装载时抛下的破碎废弃品。无独有偶,在塘沟海滨浴场附近也发现此类瓷器废弃品堆积。宋代海州作为出口外销瓷的重要港口城市于此可窥一斑。三是瓷器中的茶具与茶的饮用是分不开的。宋代饮茶,已从唐代的煮茶经五代演化为煎茶,特别讲究煎出来的茶汤颜色和茶具的款式,引以为斗胜,故“斗茶”成一时之风气。从宫廷至民间,官僚至士大夫,文人骚客乃至市井之徒无不乐此不疲。从出土瓷器的数量之多和品种之齐全看,当时海州和各地许多城市一样,人口到北宋时骤增。崇宁(1102—1106)时达54830户,199750人,茶的消费量当然是不会低的,同时,由于茶叶经销利润大而成为国内外商贸的大宗商品。为防堵茶叶走私偷税,北宋承唐制实行政府茶叶专卖制度。据《宋史·食货志》,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在全国六个州设茶叶管理机构,称榷茶所(又称榷茶所),主要是管理茶叶的流通和贸易,又在全国生产茶叶的13个山场设榷茶场。“官自为场,置吏总之”史称“六务十三场”。终北宋一朝,此制未改,海州是“六所”之一。榷茶所是管理茶叶流通和贸易的政府机构,由茶商预缴茶税凭领取的“茶引”便可来海州等所提茶,从事贩运。海州产不产茶,是否有茶场,尚无直接证据(北宋只有淮南四十州产茶,十三场亦都在淮南)。但宋代在海州设榷茶所证明它是茶叶的集散地,同时兼有征收茶税和出口贸易关税的责任。《宋史·食货志》载:“时海州入钱之数倍于他州”。

北宋初,朝鲜半岛由高丽统一,北宋政府对高丽友好。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在山东文登专设接待高丽贸易使者的驿馆,称“高丽使馆”。以后各地争相仿效,遍建高丽馆。宋神宗时(1068—1085),因辽东尽为辽国占领,宋与高丽的陆路交通断绝,故加强了从登、密二州与朝鲜半岛、日本列



岛的海上联系,而实行“黑丽”“宏丽”政策。沿海各重镇及船舶司都设有“高丽亭馆”。据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元丰(宋神宗年号)待高丽最厚,沿路亭传高丽馆。”大文豪苏东坡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78)访海州,见高丽亭馆叹其壮丽云:“檐楹飞舞垣墙外,桑柘萧条斤斧余。尽赐昆邪作奴婢,不知尚得此人无。”不过,他对其时高丽人的身份显然有误解,所谓“尽赐昆邪”之昆邪乃是指西汉武帝时俘掠匈奴人为奴,用来比附唐宪宗(806—820)时有节度使官方背景的登、莱沿海一带盗匪掠新罗人为奴的事。据史载,后来被来华的新罗人“大将军”张宝皋联合唐政府平息,唐政府为此在登、莱、密沿海各州设“新罗所”“新罗村”,以安置这些流落在中国的新罗人。唐开成年间来华的日本请益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对此有所记载。他称欲到密州境,恐“灾祸难量”,因“彼新罗与张宝高(皋)兴乱相战”。当时海州受青密节度使节制,故也设新罗村。日本请益僧圆仁在日记中记到在海州东海县东海山登岸后不久到宿城,就调到了定居在宿城的新罗村人,为其借宿并指路。北宋时海州所建的高丽亭馆主要是为了接待来海州从事通商贸易的高丽使者,与唐代的新罗村、新罗所不可同日而语。

宋元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对外出口港大多为南方诸港。加之明清两朝初期都实行裁海、禁海政策,造成民生凋敝,且元明、明清之际战争破坏,自然灾害频发,海州地区的对外海上通商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明朝在海州葭水(安东卫)、高桥、惠泽、临洪、东海(云台山)五处设巡检司,后于嘉靖十六年(1644年)废东海巡检司改在新坝,主要是为了盐运和打击淮盐走私。此时位处河海交汇、地扼南北的新坝已成为海州地区联络南北,沟通河、海的重要港口,征收船税已成必然。清代设榷关始于顺治元年(1681),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分别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光绪年间江海关移至上海,本地新坝、云台山为其分关。随着大浦港的兴起,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属胶海关海州大浦分关,它是现代连云港海关建制的雏形。内河漕运逐步向漕海运转移,加快了河、海联运的步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促进了沿海港口对外

开放,海州与海相通的各港口成为北方以粮食为主与南方交换手工业品和工业品的枢纽;内河运、盐、淮、沂、沐流经的苏北、鲁南地区的河、海联运促进了沿海港口城镇的兴起和海港建设,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改变长期以来海州“有口无港”的进程。直到清光绪三年(1877),海州近代实业家沈云沛在今海州西门、洪门(蔷薇河岸)和潮河北六里河口修建码头,筹划河、海通航。光绪五年(1882)购置三艘江南制造局的三艘火轮,直达苏州柳河港,并讲而可达南方沿海港口,转运远至香港、东南亚,海州地区开始了真正的河海联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在海州建东方二等大港的规划构想,前清邮船部侍郎沈云沛曾力主修建并最后由清政府定夺,确定建东陇海铁路以海州为出海口。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由于大浦港淤积,民国政府于1935年将东陇海铁路延至孙家山老窑,由此奠定了连云港作为当代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区位优势。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对连云港港口建设的投入。直至当代,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连云港港已成为亿吨大港、一体两翼的组合港,主体港区讲港航道25万吨级,万吨级以上生产泊位52个,与184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的现代化港口。

历史的定位只是翻过去的一页,历史经验的总结才是谋划当下的依据。历史上的连云港曾依托幅员广阔的中国内陆腹地作为商品集散地和海运枢纽港,在唐宋时期开拓了国内商品流通和陆、海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的地区之一。证明一个港口城市的经济民生与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反之,明清两朝的裁海举措、闭关自守政策的积重难返、河患灾害的长期疏于治理,影响了海州近500年的经济发展。而当代连云港能以雄姿傲立于黄海之滨,成为世界闻名的中国沿海现代化港口城市之一,正是改革开放所结的硕果。历史证明:闭关锁国没有出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开放才焕发了连云港的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朐海书院)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两 访 杨 纯

许燕蓂



1996年第二次拜访，中为杨纯

杨纯，女，四川峨眉人，1917年出生于北京，原名万国瑞，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山东淄博特委组织部长，皖东北特委书记，苏皖区党委二地委书记（管辖东海、灌云、沐阳、宿迁等县），苏皖二、三地委书记，盐阜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周恩来总理秘书，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卫生部副部长等职。2005年1月在京逝世，享年88岁。

杨纯的传奇人生

她，幼年好学，聪明过人。父亲万树芳曾跟随峨

眉山十吴玉章东渡日本留学，接触进步思想，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母亲思想开朗，崇拜秋瑾，主张妇女自立。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杨纯四五岁时已经会背诵唐宋诗词百余首。

杨纯是爱国学生的领袖。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爱国救亡浪潮风起云涌。时杨纯在南京中华女中读初二，学校只组织高中同学上街游行，她自行组织救护队，自任队长，与高中同学一起上街，呼喊口号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道理。1935年，她在武汉女中读高三。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杰出的组织能力和雄辩的口才，杨纯被选为女中学生



会主席和武汉三镇学联委员。在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中,她担任武汉三镇学生游行副总指挥(总指挥为武汉大学学生)。次年考入武汉大学后,在地下党的教育影响下,与进步学生成立秘密组织,编辑出版秘密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被武汉当局盯梢追捕,被迫逃亡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卢沟桥事变后,杨纯在北京地下党的安排下,几经周转,来到济南,参加韩复榘的政训组。这个班名为韩复榘办,实际是用其名,用其钱,实为我党掌握。为保密和安全起见,杨纯改名换姓,将万国瑞改为杨纯,此后就以此名进行革命工作。

杨纯是一名神枪手。在政训班结业后,她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先任宣传队长,后调到一团任政治部主任。为了工作方便,能与战士打成一片,她毅然决定不要秀发,剃个光头去上任。不久团长、政委因故离开,21岁的杨纯,挑起了领导近千人的一个团的任务。在此期间,她练就了许多硬本领。她能举枪打落天上的小鸟,战士们都夸她是神枪手。在一次战斗中,她这个神枪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支队要求她率领一团,拔掉八陡镇据点。因敌我力量相当,杨纯决定夜袭取胜。她深入前沿指挥战斗,眼见两批爆破手被敌人炮楼里的机枪射倒,她眼睛红了,从前沿掩体一跃而出,冲到炮楼不远处,对准炮楼的枪眼打了几枪,敌人的机枪顿时哑火,爆破手乘机而上,炸毁了敌炮楼。杨纯手一挥,战士们蜂涌而上,消灭了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由此,“神枪手”的名声在部队广为传扬。

杨纯在任淄博特委组织部长期间,书记金明给她配了一名警卫员和马匹、枪支。杨纯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练就了骑马射击的硬本事,她能用最高速骑马连续两三个小时,遇有小沟小渠一跃而过,还不时地到僻野山岔处打野味,改善机关生活。

杨纯为革命两次女扮男装。1939年2月,中共山东分局要她去苏皖边区开展工作。她又剃光了头,弄脏了脸,女扮男装,化装成小伙计,跟随一个老交通员,闯过多道关口,忍饥挨饿睡草窝,终于在皖东北泗阳县的一个小镇与当地的特别支部书记江卜青接上头。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

作,在基层建立了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后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建立了皖东北特委,由杨纯任书记,江卜青和另一位同志任委员。1939年秋,日寇进一步强化徐州方面的兵力,苏皖边区环境日益恶化。为此,我主力部队决定北撤,杨纯和地方骨干留在海属地区坚持斗争。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她再一次女扮男装,与二地委机关一起,转移到灌云县卜马台一带。在这里,杨纯依靠当地力量,与敌人打游击,重建武装,创建人民政权。

1940年4月,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华中局任命杨纯兼任三地委书记,这样,二、三地委两副重担就压在年方23岁的杨纯肩上。她统管了13个县、2万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人口六七百万,田地八九百万亩。她在刘少奇、黄克诚等领导人的谆谆教导和指导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1953年秋,杨纯被调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当秘书,周总理还夸她“抗日战争以来,你一直是一个方面的大员了!”

第一次拜访

对这样的女豪杰我早有所闻,仰慕已久,总想一睹她的风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拜访王光美同志,得知杨纯就住在旁边另一幢楼上,我很高兴,随即去登门拜访。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位个子不高,头发花白普普通通的老人,与我脑海想象的大相径庭。这可能是我一时兴奋,忘却了她的年龄。她很和善地将我带进会客室,会客室的家具很普通。当她得知我是从原海属地区连云港市来的,很高兴,讲起了当年在那里工作、生活、战斗的一些事。她说,1939年7月,海属地区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周法乾制造事端,杀害我抗日武装三团团长汤曙红,将十们要为团长报仇。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苏皖区党委随即任命杨志雄为三团团长,任命杨纯为二地委书记兼三团政委。经过一番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调整,才稳定了军心,保住了这支抗日武装,后来三团被编入主力部队。

说到东海,杨纯讲起了去东海郇圩开展工作的情况。杨纯介绍说,在听取了东海的周晓江、郇华民、李铁民、郇民爱等工作汇报后,杨纯要求他们尽



快建立政权,建立武装。后不到半年时间,周晓江他们就把区政权建立起来,同时还建立一支武装小分队。杨纯还讲述了在灌云拜访了李干成、万金培等十多位老同志,请他们出来参加抗日工作的事。这批老同志出来后,对地方情况熟悉,又有工作能力,使海属地区的抗日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

海属地区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具体情况,杨老如数家珍,讲述了当时与她在一起战斗生活过的战友,如吴书、汤若瑜、杨肇庭、孙海光、孙良浩、孙朝旭、孙存楼……对自己的情感婚姻生活,性格爽朗的杨老也毫不避讳地给我们进行了介绍。

杨老介绍说,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939年。那时,张爱萍将军率领的八路军支队和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驻在泗县张塘,杨纯的皖东北特委机关也驻在张塘,这样张、杨二人接触的机会多,久而久之,产生了爱情,结合在一起了。后来杨纯任二地委书记又兼任三团政委,工作重点东移,二人驻地分开,又都是各忙各的事业,结婚两年多,生活在一起只有三个月。后来为了革命,为了事业,她们就分开了。两人分开后,仍然保持着革命同志的关系,保持着来往和友谊。后来当张爱萍与李幼兰重结良缘时,杨纯也前往贺喜。以后几十年中杨纯和张爱萍两个家庭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们还是好同志、好朋友。

杨老的第二次恋情于1941年春开始。当时苏皖区党委改为淮海区党委,金明任区党委书记,杨纯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张彦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杨纯与黄克诚夫人胡加珍(即唐棣华)住在一起,在金明、黄克诚的关心和撮合下,杨纯与张彦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于1942年5月结婚。

第一次拜访杨老时,她已70多岁,但精神饱满,爽朗、健谈,联想到她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英雄业绩,使我由衷地敬佩。我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来我们连云港旧地重游,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第二次拜访

1996年我正式退休之后,当时市委党史办正在编写民主革命时期的地方党史,计划邀请民主革命时期在我市工作过的老领导题词,于是我带着这

个任务第二次拜访了杨老。

我和老伴刘桂兰一起踏入杨老的家门,杨老记忆力非常好,一见面就认出我是连云港的。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说明来意,杨老很爽快地答应,并答应过几天写好后寄给我们。她还仔细询问了我们连云港市的一些情况。时近中午,我们邀请她与我们合影留念,她欣然应允。

回到连云港不久,就收到杨老寄来的题词,上书“弘扬革命传统,建设连云港”,这是对连云港市的热切期望。杨老的题词刚劲有力,看不出这是近80岁老人所书,字里行间隐含着当年英勇善战的英姿。

(作者系原市委党史工委主任)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杨纯题写的“弘扬革命传统,建设连云港”



也说“新浦”

韩世泳

2014年7月7日,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江苏省调整连云港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和《省政府关于调整连云港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精神,正式印发《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和《〈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实施意见〉通知》,撤销原新浦区、海州区,设立新的海州区。次日,新的海州区揭牌。这是市委、市政府从全市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实际需要作出的决策。区划调整后,新的海州区区委、区政府立即带领全区人民,立足新区情,采取新举措,掀起了加快建设、发展新海州的热潮。大量报道见诸报端,令人鼓舞。

然而,在很多宣传舆论中也出现了一些让人不

解的说法,说原新浦区撤销后“新浦已经成为历史”“不存在”了,连市权威媒体上也屡见此类说法。如,2014年7月14日《苍梧晚报》A2版刊登的《新浦二桥开工建设》报道中说,该桥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已经成为历史的新浦”。报道说,“随着我市行政区划正式调整,‘新浦’这个地名已不复存在……用‘新浦’命名桥梁……让‘新浦’不会随着地名消失而渐渐被忘却”。三天之后,《连云港日报》在一篇报道中也说“新浦”“已经成为历史”。一时间,“新浦”地名成了热门话题。有的部门认为凡原登记“地址中含有‘新浦’的都必须变更”,很多人们熟知的在新浦的小区、单位,报道中都说成是“海州区××小区”。对此很多人感到不解,无所适从。



美丽新浦





原新浦口所在地,今孔望山东北角的玉带河闸附近(韩世泳 摄)

我市这次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后,“新浦”这个地名真的“成为历史”就此“消失”了?笔者认为,这类说法欠妥,有些问题需要厘清,故也来说说“新浦”这个地名。

“新浦”地名已扎根民间

200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江苏政区通典》说,新浦这个地方“原为古海州沿海地域”“清乾隆年间(1736~1820年)新浦临洪滩以东、孔望山以北逐渐成陆”。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新浦”一词最早见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志载海州知州唐仲翼写的《甲子河记》说“中河旧引盐闸清流经安东、茌溪至五障、项冲,受六塘河而北汇板浦为场河,又板浦历卞家浦过孔望山出州东北为新浦,皆盐运所经。”这里所说的“新浦”是“盐运所经”的一条小河。古海州地区将小河也称作“浦”。“板浦”“卞家浦”和“新浦”,也都是在大海迁徙过程中先后出现于运盐河尾闾的小河流,而后经疏浚拓宽而成为运盐河新的入海河道。“新浦”因流经朐山下,当地人又称“朐山河”。

在《甲子河记》中,唐知州在记述甲子河起止位置时写道,该河“东自新浦口,西达城东门”。这“新浦口”即“新浦”(朐山河)的入海口,就在孔望山的东北角、今新浦盐河路上玉带河桥(原称“工农桥”)附近,是确指地址的地名。在其后追随海岸迁徙过程中,“新浦口”渐被简称为“新浦”这个地名。

新浦这个地方成陆很晚,但因得地利天时之

好,很快成了紧靠海州古城的一个新兴的农副产品交易之地,渤海商船也争相载货来此交易。随着交易之兴,人口渐增,遂成集镇。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七年(1891~1901年)新浦天后宫建成,商业日兴,新浦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黄金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后期,因陇海铁路通达新浦、大浦,大浦筑港,自行对外开放,新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黄金期。其间,大街商铺翻建一新,原低矮茅屋棚舍,变成了洋溢着民国建筑风情的二三层楼房。电灯、电话、有线电报、轮船、航空等相继出现,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不断增多。民国23年(1934年)11月形成的《连云港埠区域地价变迁及地权分配概况调查报告书》中就说,“新浦市面尤为繁荣,俨然有大都市之风,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商店约有八百余家,最大者有五六十万之资本;旅馆业亦有三十余家,营业甚为发达。”商贸繁荣的“大都市之风”赋予“新浦”这个地名旺盛的生命力。

1948年11月7~9日,新海连地区全境解放以来,新浦一直是连云港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是连云港港口的依托城市,在港城的改革开放和全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招商引资、跨越发展,新浦更呈现了史无前例繁荣景象。“新浦”这个地名,已渐与繁荣、美丽、文明、人文、宜居融为一体。像这样一个有着强大吸引力的地方的地名,怎么会因为“新浦区”的撤销而“消失”“不复存在”呢?



再说,“新浦”这个地名问世 200 多年来,已成为十代“新浦人”的籍贯,新浦是他们的出生之地、生长之地、生活之地,更是他们亲自开发、建设之地。“新浦”这个地名不仅仅已牢牢扎根于一代代新浦人和生长于此而后迁居外地、境外甚至国外的新浦人的心中,也已扎根于视新浦为第二故乡的客籍“新浦人”心中,他们也不会忘记“新浦”。像这样一个扎根于民众之中的地名是不会因为“新浦区”的撤销而“消失”不复存在的。

“新浦”和“新浦区”是两个不同概念

那么,为什么在新浦区撤销后会出现“‘新浦’这一地名已不复存在,‘新浦’已成为历史”,甚至认为“‘新浦’会随着地名的消失而渐渐被人们忘却”了的说法呢?

关键是混同了地名“新浦”与区划名“新浦区”这两个不同概念。

地名,是一定地域或一个具体地点、自然实体的名称。如,新浦、海州、连云、板浦、新坝、浦南、云台山、白虎山、石棚山、大村水库、园林水库等,都是代指一个地方或自然实体的名词。他们通常是生产于民间,往往是先由个别人指认,而后得到大家认同而成的。地名一经为民众认同,就扎根于民间,并被不断传承,有的能沿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不变。

而区划名是各级国家机关为了便于充分发挥一定地域内的各种资源作用,便于行政管理而划分的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域的名称。同样,各级政府根据需要也可以适时调整行政区划,依照法规报经上级政府批准即可实施。

解放至今,我市行政区划名称就多次发生变化:1948年11月9日,新浦、海州、连云全境解放,设立新海连特区。1949年11月11日,特区撤销,改设新海连市。1950年5月1日,省政府决定新海连市与东海县合并,设立新海县。同年12月12日,省政府又决定撤销新海县,恢复新海连市和东海县行政区划。1961年10月1日,新海连市改称连云港市。13年中我市行政区划名称就发生了5次变化。

新浦、海州地区的区划名称也多次发生变化:刚解放时,两地为新海连特区的新海市。其中,新浦地区先后设立民主区、新华区、新龙区和通灌区;海州地区设立锦屏区。不久,通灌区撤销并入民主区。1949年11月11日,新海市撤销。新浦、海州地区的几个区直属市政府领导。同年11月,新海县将新浦、海州地区4个区名变更为新海县的一区、二区、三区、四区。同年12月,随新海连市建置恢复,新海地区4个区恢复原名。1951年8月,市政府决定撤销民主、新华、新龙3个区,设置龙尾区和盐河区。1952年7月,锦屏区易名为海州区。1955年11月,龙尾区、盐河区合并设立新浦区。1983年6月,市委、市政府调整市区行政区划,由原新浦区、海州区和市直属的新坝公社、锦屏公社、国有锦屏林场、孔望山果园、新浦农场整合设置新浦区。1986年6月,新浦区撤销,恢复新浦区、海州区的区划名。加上这次区划调整,设置新的海州区,66年间,新浦、海州地区区(县)的区划名称变化达10多次。

由此可见,行政区划的命名和撤销,纯属政府行政行为,是行政需要的产物。

新浦这个地名是自然环境变化、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民众生活、社会交往需要的产物,本来与一地建置无关。200多年来,不管行政区划怎么调整,区划名怎么变化,新浦这个地名还是原来的地名,从未因行政区划名变化而变化,更没因区划名撤销而消失。而且,去年7月初,市区行政区划调整,国务院、省政府文件都说得极为明确是“撤销原新浦区、海州区,设置新的海州区”而并非是撤销“新浦”这个地名。因此,认为“撤销原新浦区”,“新浦”这个地名也“不复存在了”,显然是混同了两个不同概念。“新浦”这个地名在未被作区划名前已叫响远近。新浦区设置59年间,新浦这个地方更加繁荣昌盛,其知名度更高。原新浦区撤销后,新浦这个区域仍然是新的海州区乃至港城的中心城区,“新浦”这个地名是不会因新浦区的撤销而消失的。

(作者单位:海州区志办)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海浦观潮说水流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八

伏广喜 阎祥富 杨庆昌



清《云台山志》上的水流村图

出诸吴东一公里,即进入水流村(今名丹甯)地界。放眼望去,只见这个小村庄青山叠翠,绿树依依,田畴舒展,农舍星罗,一幅典型的山村图景。在百川先生的笔下,这个小山村是美丽而富庶的:“远望青山小雨过,水流村里蔚蓝拖。香垂白黍识翻雪,穗满红莲半蘸波。万陇根深云子密,一畦花落稻子多。攀萝杆笏情无限,遥看峰明尚湿螺。”但300年前,水流村却和现在的西墅、东哨、院前一样,是典型的渔村。在明顾乾的《云台山志》中,对水流村是这样介绍的:“水流村,前接海潮,一望无际。秋水弥漫,渔罾竞出,颇有烟波胜景。”“罾”就是用水架制成的一种捕鱼工具,而“渔罾竞出”则告诉我们,全村人都争先恐后地在海边张罾捕鱼。“海浦秋潮阔,渔人晚兴乘。夕阳一片影,烟火几家罾。”这是当年顾乾吟咏水流村的一首诗,形象地勾勒出当年水流村海天相接、渔人忙碌的景象。

从地方史料上可以看到,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云台山四面还被海水包围着。仅仅300年时间,过去秋水弥漫、白帆点点的渔乡变成了如今的稻麦飘香、一马平川的沃野。

云台山四邻海水,有着漫长的历史。大约在一万年前,全球性的气候转暖,海平面不断提升。到五六千年前,达到最高值。当时的“黄海平原”全被万顷碧波覆盖。到秦汉间,云台山大部分山体还被海水环绕着,成为海十三山。北宋年间,苏东坡两来海州,极目对面的云台山却不能登临,只能发出“欲济



东海县,恨无石桥梁”的感叹。明代的孔望山东,依然是“潺潺胸海东流”。降庆时知州杨本俊曾留下“山如驾海海围山,山海奇观在此间”的著名诗句。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海州东孔望山与南城西山间还隔着一条10多里宽的海峡,名黑风口。打开今日的地图,按图索骥,我们可以看到,从新浦到大浦、猴嘴一线;从朝阳至虎山、开发区的后山、江庄、云门至大板桥一线;从灌云东辛乡至东辛农场、海军农场一线,均处在海水包围之中。当时,人们把云台山内地称“海里”,把云台山水外圈地区(一般指海州、赣榆、灌云西部等地)称“海外”。这一时期的海岸线是从盱眙出云梯关的古淮口经白河港、板浦、新坝、朐山东、青口、斜石界至安东卫。船只航道是从响水口至南城,讨五羊湖至墟沟,再至安东卫。此时的云台山海景相当优美,顾乾的《云台山三十六景》中,就有板浦的“沙堤接引”,关中的“水封获稼”,山东庄的“石桥流水”,东磊的“潮吞双岛”,渔湾的“三潭汲浪”,新滩的“沙渚听潮”,白果树的“命湖潮信”,孙家山的“钓台夜月”;水流村也列其中,名“海浦观潮”。当时的水流村,为茫茫云台山中一分子,位于公浦和补林浦之间,四环青山,波平水阔,是一个天然渔场。可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世世代代靠海捕为生的水流人被迫转岗。原因呢?是海陆变迁。这在本市清代的地方志书上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录。诸如“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海涨淤,渡口渐失。”(清《云台山志》)“淤成陆,渐成桑田”(清《云台新志》)。这些沙从何来?原来,南宋绍兴五年(1134年),黄河在阳武(今河北原阳县)决口,南下冲入泗水夺据淮河以下的河槽,滚滚黄河水便涌了进来。此时,尚有部分黄河水流向渤海,而到明天顺三年(1459年),便全部由徐州经苏北入海,一直持续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云台山的成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原运盐河从板浦穿境而过,而在明泰昌元年(1620年)就开始淤塞,经两次疏浚均不能解决问题。云台山首先成陆的地段是山东庄至板浦之间的那块海域,时间是康熙四十年

(1701年),史称“沙堤接引”。而前面提到的黑风口到乾隆六年(1741年)还未成陆,去对岸还要“舟行10里”,由“中正转道”,而五羊湖成陆时间一直至咸丰元年(1851年)。水流村地处云台山南,靠近山东庄,成陆时间应当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

水流村与海的话题真是源远流长。不止曾为渔村,还出了一位《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海防三》中反复提及的人物。他叫江之藩,字杜若。自幼入洋,后为贡生。自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迁海(本地称裁海)的那十多年间,他为复海上下奔走,反复呼号,终于等来了迁海令废。民国年间刊行的《苍梧片影》称其行动为“书生复海”。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为防止明旧臣郑成功海上进攻,清世祖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8月3日,下达东南沿海《迁海令》。其目的是断绝郑军粮草等物资补给,让其自然瓦解。这就是历史上的迁海。

《迁海令》规定:沿海向内划耕30—50里,设立界桩或垒土为界,派兵把守,出界者死。限定3日,不迁者格杀勿论。《迁海令》下决后,山内居民扶老携幼,抛家弃祖。人员尽撤后,原村庄人去巷空,田地荒芜,盐池尽废,寺宇坍塌,荒草丛生,俨若无人区。当时的江之藩为一贡生,迁海后无家可归。后流落镇江,寄人篱下。经反复思考,认为该迁海行动有悖国计民生。于是毅然回到海州,联络同窗好友杨肤功、郑三乐、成天章等,共商吁请朝廷开复云台



连云港海岸线变迁图



事宜。用将近十年时间,反复斟酌,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5月2日,向朝廷相关部门递上了《请复云台状》。接此书状后,漕运总督帅颜保批转淮扬道文武官员详复。其后,帅颜保又与礼部侍郎拓尔肯、江南、江西总督阿西熙等共同复议,上奏皇上。康熙十六年(1677年)闰二月初二,清廷颁旨,撤销《迁海令》。至此,划出17年的云台山回归内地。

按照地方志书上的记载,当时的云台山在可迁可不迁范围,就因为当时前来勘界的苏纳海因为那天海风太大,未能亲到现场察看,才草率地将这本可不迁的云台山定在迁海之列。现在看来,这未免冤枉了这位苏大人。当时的《迁海令》是全国一刀裁。苏纳海纵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能将这南北数千里的海疆从古海州这里留下一截。其实这位苏大人在云台迁海这个问题上,对云台山不仅无过,还有点功呢。按照《迁海令》上沿海向内划迁30—50里的规定,当时的海州东也为沿海。如果以此为起点,恐怕不仅整个海州城保不住,今天的东海县都要削下一截。不管怎么说,对江之燕他们,我们还是要做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甘冒风险,逆朝廷的政策而上,不厌其烦地奔走近十年,其爱国爱乡之情的确非常难得。但是,将云台山开复的功劳片面的记在他们头上那就不对了。正确说法应当是,他们和全国沿海地区的有识之士共同呼吁,加之后来郑成功对朝廷已形成不了大的威胁,才使朝廷下决心取消这道政令。从今天的角度来说,由于江之燕等人的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古海州清初的建置、海域、盐业、军事、民俗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只可惜,那部汇集了复海吁请的整个文献《复山集》没能流传下来。

海退之后,水流村自然风光魅力不减。这片不到600公顷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美如画的山头。首西的山头也就是最高的山头叫狮头山,海拔276.5米,它雄峙于南车厢山南,为南北山脊,中间转向西北。北头突起一危岩,如雄狮昂首,故名狮子山。岭上多生赤松,东坡为针叶、阔叶混交林。北面为磨盘山,磨盘山为九岭山脊的一支分岔,海拔187米,山头山崖重叠,活似一个巨型磨。东南为大合口山,海拔111米,山体多裸岩。以山势奇曲、形状怪异、岩面光洁见称。但部分地区也有赤松、麻

栎等阔叶树林。更值得一提的是村东北的铁山头。虽然它在境内的山头中属于小兄弟(海拔92米),却以独有的特色被世人关注,它为我市比较典型的丹霞地貌代表之一。丹霞地貌,分丹霞地貌和丹霞山色两种。铁山头为后者。其山由于含铁量高,其岩石呈铁红色、铁锈色或铁黑色,看上去如赤辉普照,灿若晚霞。这一特殊的自然现象早在宋代就被人们注意到了,称这里的村庄叫丹霞庄。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将水流村更名为丹霞村。

有名山即有名洞。一条为丹霞洞。其源于灯盏窝,如一条蔚蓝的玉带,从葫芦山东侧汇入妇联河。全长4.2千米,其洞沿途古迹很多,风光优美,为春游胜地。一条为马洞。其洞因山而名,位于马洞山东坡峡谷。由马洞山东坡和火岭山西坡之水冲刷而成。洞水向东流入丹霞洞,汇入妇联河,全长1.8千米。在这些山脚下,环绕着几条古老的河道。它们为南沙岭河、丹霞河和东寮河。它们和那些山一样见证着水流村的古老和文明。

水流村的人文底蕴也很丰厚。

清朝中期,这里诞生过一所与即林园、半山园、渔湾山庄齐名的私家园林,名曰瞻园。瞻,古“蚊”字也。瞻即眼上的睫毛。瞻园为谦词,即小的意思。此园林为灌云中正吴氏所建。所以当地人又称该园为吴园。据清《云台新志》载,这里“高山矗立,涧水环抱。泉流顺山下注,土人呼贴山沟。”该园虽称瞻园,却玲珑剔透,古朴典雅。园中,饶有花竹泉石,亭台楼阁。有云在庵、春雨楼、言息其庐诸名胜,为一清幽别致的避暑、休闲之所。

水流村历史上出过一位著名的僧人,被清《云台山志》收录。他居云台山上,结草栖禅,夜夜诵经,经久不辍。据传曾有女神前来试禅,他禅心弥坚,不为所动。他一心向佛,清心寡欲,一直活到80多岁后坐化。后人为纪念他,在村北丹霞庄建一寺庙,名丹霞寺,村民称该高僧为丹霞僧。淮安知府陈文述曾写过一首题为《东海仙迹诗》赞美这位老僧的功德。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浅析地方史志资料的开发与利用

贾栋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地方史志资料作为一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载记录地方历史、继承挖掘地域文化、补充完善国史资料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围绕地方史志资料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其资政育人的先天优势,进而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地方史志资料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对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所作的重要批示中强调,要“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这说明,地方史志资料的开发利用与其编纂、管理工作同等重要。

应该说,史志资料自诞生那天起,就同时承担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保存真实历史;另一方面则是以古鉴今,为后人提供值得思考和借鉴的经验教训。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两者不可偏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史为鉴、探索未来的行为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古代,有如《左传》这般凭借其“春秋笔法”,以一字一词的变换隐晦地阐释作者的观点;也有如《史记》这样在文末加以评论,通过“太史公曰”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抒发对历史的慨叹。在当代,虽然在史志编纂过程中力求“述而不作”,追求客观,但在实践操作层面依然有着对入志资料内容范围、叙述角度等多方面的把握,同时在编纂中会对史志资料进行二次加工,事实上也不可避免地掺杂或多或少的主观思想。

地方史志资料的开发利用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地方史作为历史记录的原始资料,其潜在的附加值有待深层次挖掘。地方史志资料虽然在编纂过程中已经过二次加工,但在“述而不作”的标准要求下,其仍是以原始史实为主,缺乏对历史规律、历史经验教训的提炼和思考。而从古代的优秀史论中可以看出,凝聚了编纂者对历史智慧思索的文字往往一针见血、引人深思,是史志资料中的点睛之笔,其中也不乏千古流传的名篇。由此可见,围绕地方史志资料进行研究挖掘,提升其附加价值应成为编纂者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史志资料的自身特点决定其必须立足于编著眼于用。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再优秀的史志资料一旦束之高阁,其价值也必将无从体现。因此,做好地方史志资料的开发利用,最大化地发挥其价值,是延长史志资料生命力的重要途径。

二、古代史志资料的开发利用及地方史自身特点

综合来看,古代史志资料的开发利用大致形成了两种类型。一是精英化。代表是《二十五史》之类的官方修史,或是《资治通鉴》之类的资政著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主政者或是有可能成为主政者的读书人提供参考和学习资料,内容相对深奥,侧重资政作用,旨在为官方决策提供借鉴。二是大众化。代表是《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演义,乃至数量更多的相关戏剧评书、野史杂闻等。其表现形式众多,内容较为通俗易懂,主要体现教化育人作用。例如从关公忠义形象深入人心等事实即可看出这类史志资料在思想教育方面对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此外,在考虑地方史志资料的开发利用时,还必须注意地方史的自身特点。上文所述的古代史志资料多为一国史,而地方史则有别于此。地方史与国史的不同主要有三点:一是涵盖范围不同。地方史的性质决定了其内容范围仅限于本地域,相比较国史在综合性上显然不足。二是侧重点不同。国史涵盖广阔,大事要事众多;地方史侧重地方大事要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三是影响力不同。国史研究者、爱好者广泛,影响深远。地方史则重点在本地域、影响力相对薄弱。同时,地方史多为综合类资料,和专业资料相比在专业性上则相对不足。如综合性年鉴与统计年鉴等专业年鉴相比,后者在数据方面的权威性和利用率上显然更具优势。

三、地方史志资料开发利用所面临的现状

当前,地方史志资料开发利用所面临的现状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获取资讯的方式更加多元。获取信息更加便利。人们可以选择网络、移动终端、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多种传播方式,纸质类书籍只是其中一种。二是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改变着读者的阅读方式,浅阅读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这从微博、微信等盛行都可以看出。上述两点不仅是地方史志资料遇到的困扰,也是同类的纸质图书所要应对的难题。三是国学热、史学热的兴起。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看,弘扬国学、继承历史无疑对铸造民族文化、增强凝聚力和信心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政策的扶持对地方史志工作的开展作用明显。从近年来广受喜爱的讲座论坛、电影电视中也不难看出大众对历史文化的热爱。这对于地方史志资料的开发利用无疑是好消息。

四、地方史志资料开发利用思路探析

地方史志资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开发利用。

一是编研宣相结合。史志编纂作为基础性工作,为深层次的研究和针对性的宣传提供资料支撑。史志研究则有针对性地提升挖掘潜在价值,使其附加值得以最大化,为决策咨询、社会化服务提供智力支持。史志宣传则进一步放大价值效应,增强对史志工作的关注度。具体而言,第一,发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效应。如结合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地情知识的普及宣传,结合时下热点进行挖掘整理,如为“一带一路”等热点造势宣传。结合外地史志类部门的做法来看,有的地方还坚持突出地方特色,如以发掘当地大姓宗族文化为纽带,成立联谊

会,服务地区招商引资工作。第二,服务决策参考。发扬史志以古鉴今的本质属性,围绕地方中心工作,进行课题化、专业化的研究。但同时也应注意隔行如隔山的问题,在进行研究前,必须学习相当数量的专业资料,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第三,挖掘地域文化,进行文艺创作。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如《西游记》一书对连云港经济旅游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二是增讲与机构、市场的合作与开发。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机构内部的合作交流,二是面向市场进行针对性开发。政府机构内部的合作交流包括四个部分,即“系统内”“系统外”“同类部门内”“同类部门外”,可采取的方式有业务交流、课题研究、编纂整合等。“系统内”是指史志系统内部,包括横向与纵向的业务部门。“系统外”是指史志系统外的史志研究者和爱好者。“同类部门内”是指具有相似或相近的职能性质的部门机构,如社科院、档案馆等。“同类部门外”是指其他部门机构。机构间的合作在過去各地史志类部门的做法中可以得到例证。如联合宣传部门进行地情资料宣传、联合社科部门进行课题研究、联合法制部门进行地方志工作条例督查等等。关于面向市场进行针对性开发,这里的市场是指受众(读者)市场,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需求开发不同层次的产品。如研究者需要高精尖的专业资料,旅游者则需要风趣幽默兼具文化底蕴的旅游手册,爱好地方文化者需要内容翔实、凸显地方特色的文艺类书籍等。同时做好受众群体的信息反馈,不断改进优化史志工作。通过加强双向的合作交流,增讲外界对史志工作的认识和了解,进而提升社会各界对史志工作的支持。

三是延伸产业链。史志工作的外延非常广泛,包括社科、经济、文化、宣传、博物、档案、旅游等多个领域都可以介入。通过专业性研究、特色式挖掘、规模化积累,可以逐步为诸多领域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如有的史志类部门通过积累照片、文字资料进而形成规模,为展览、书籍编纂提供服务等。

综上所述,地方史志资料的开发与利用对开展地方史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开发利用中坚持多管齐下,以组合拳出击的方式放大史志工作价值,有助于发挥史志资政育人的先天优势,从而更加主动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抗日英雄胡文臣

黄正明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年前,笔者在天津市和平区两次访问胡文臣的二女儿,89 岁高龄的胡静媛。下面的照片是胡静媛提供的胡文臣将军生前与家人的合影。



胡文臣(1889—1939),字相卿,天津静海县杨芬港人,出生在贫寒的农渔家庭。他自幼喜好习武,青年时,经常在农闲时到市区卖艺挣点钱贴补家里度日。有一次卖艺时,被一位姓宋的军队某部统领发现,觉得胡文臣身材高大,腿脚灵活,性格爽朗,就让他参军当勤务兵,很快被提拔为大队长,随军到了江苏。不久,胡文臣把一家人搬迁到江苏灌云兴庄。

1929 年,胡文臣任税警第三区区长(中校),驻防苏北云台山之南的东臧山,负责淮北盐场盐业税务的警保工作。

1935 年前后,南北二十队盗匪活动频繁,经常

抢劫民众财物,胡文臣为保一方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常动用盐警部队为民剿匪,深受当地民众爱戴和欢迎。为感激胡文臣团长的恩情,当地百姓曾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在龙王口为胡文臣立了一块“除暴安民”石碑,以表彰他对人民的功绩。

1938 年,日寇开始对连云港地区发起进攻,企图从连云港登陆。盐警部队被改编为国民党陆军游击第 8 军,军长曾锡珪。该军下设六个总队(团级)。胡文臣为第三总队总队长,驻防连云港之南翼的海防重地东臧山。他带领第三总队与兄弟总队官兵一起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从连云港一带海上登陆的企图。当时日军已逼近其防地,为勉励部属抗战士气,胡赋诗:“日寇犯我边疆,飞机到处逞强,为免轰炸殃及,依山筑寨避将”刻于防空洞石壁。(见下页图)

9 月,胡文臣率部镇守云台山。24 日上午,日军在 4 架飞机掩护下从高公岛一带分三路进攻胡的防地,胡文臣与士兵生死与共,固守阵地,激战中日军伤亡惨重。战后,胡文臣受国民政府一级传令嘉奖,晋升为少将。

1938 年底,胡文臣奉命率部开赴泗阳县洋河镇,增援被日军包围的第 33 师,解围后奉调宿迁县城,堵击由徐州进犯之敌。当部队刚到仰化时,遭到敌机低空扫射,因掩蔽及时,未遭伤亡。临近宿迁时,军械官徐本鼎惧敌怯阵,被胡文臣当场处决,为怯阵者戒。胡率部进驻宿迁县城后,被敌军层层包围,激战数小时,胡负重伤,仍手持大刀,奋力指挥部队突围。突出县城后遭敌伏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杀





封其灿著《血战连云—连云港抗战碑刻》介绍藏军洞的图片

敌百余,并击落低空扫射的敌机一架。第二天下午,宿迁县城南门被日寇攻破,胡文臣亲率部队向南门冲杀,距南门不远处被敌军枪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50岁。

胡静媛回忆说:“1938年,我才14岁。记得父亲对我们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国家有难,我们必须保卫国家!于是,立即将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送回天津老家(原河北省静海县),没想到竟是永别。”

胡文臣将军阵亡的噩耗传出后,淮海大地爱国军民万分悲痛,文人自发写诗悼念。笔者抄录灌云县白蚬乡的一位曾在国民党军某部任幕僚后又回家教书的爱国人十张振源当时撰写的“吊胡文臣团长”诗一首。后由其儿子张廷远(杨集中学校医)保留下来的。原诗如下:

吊胡文臣团长 步卢在民吊胡团长阵亡原韵

谁将侠骨葬蒿莱,战后惟闻处处哀。
官佐兵夫齐洒泪,沙虫狼鹤半成灰。
忠魂西去招无计,泗水东流哭不回。
我欲向天搔首问,倭奴尚待几时摧。

莽莽妖气匝地生,将军慷慨请长缨。

但知家国兴亡事,那管安危祸福情。
一死最难能抗敌,千秋不负号知兵。
裹尸马革何须惜,剩有如虹浩气横。

闻道睢东生野烟,传来垂耗食难咽。
丰功应列平倭史,壮志能撑大愿船。
冀北人悲千里骏,淮南鸟泣万山鹃。
海滨不乏承恩者,德政难忘记昔年。

平生报国具丹心,阵地无端起计音。
海属十年遗爱在,泗阳一夜火星沉。
人忧亡国悲愈切,天为怜才昼亦阴。
何处招魂徒怅望,临风惟有泪沾襟。

胡文臣的妻子儿女从兴许返回天津后,很多年来一直不知胡文臣的消息。他们辗转找遍大半个中国,也没得到半点消息。连云港人民并没有忘记胡文臣将军。2005年,连云港市花果山乡朱开亮先生在天津市一报纸上刊登《老区人寻找抗日烈士后人》文章,寻找胡文臣烈士的后人。见报当日,便有读者打电话提供线索,确认胡文臣的二女儿胡静媛住在天津市和平区蛇口道。该报记者赵紫登门拜访了胡静媛等兄弟姊妹六人,并发表一篇题为《烈士十六子女深情回忆父亲》的报道。

今年年初笔者拜访胡静媛时,得知其兄弟姊妹中已去世4人,只剩下胡静媛和体弱多病的弟弟胡宝鑫(80岁)。胡静媛说:“2005年得知父亲是抗日牺牲的消息后,全家人都很欣慰。”“我的儿子、侄儿,2005年曾去连云港和宿迁市,寻找父亲战斗和牺牲的地方,与东藏山附近一位老大爷在‘藏军洞’旁合影留念,但没有弄清父亲牺牲的准确地点,更没找到父亲的坟墓。”

胡静媛的儿子曹会国对笔者说:“今后我们肯定还会去连云港祭扫。”笔者深情地说,连云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抗战而牺牲的先烈,永远不会忘记抗日英雄胡文臣将军!

1982年,胡文臣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记有胡文臣将军的名字。

(作者单位:灌云杨集镇文化站)

责任编辑 于冰洁



刘明宣与《大社的优越性》

张学贤

刘明宣,1926年8月出生于山东临沂,1944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小学校长,区公所助理,市供销社秘书科长,市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文革后期在市农办、农委、农工部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1986年12月离休,离休后享受厅(局)级政治生活待遇。2014年12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89岁。刘明宣同志长期从事农村工作,为宣传朝阳经验奉献了大半生。

1960年初,笔者从新海连日报社调市委办公室任秘书,与刘明宣同志共事三年,时间虽然短暂,但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好思想好作风,特别是他先后协助市委总结朝阳乡前讲农业互助合作经验和“包产到户十大好处汇报提纲”两件事,让笔者钦佩不已,难以忘怀。

协助市委总结前讲合作社经验,为港城人民留下最珍贵的笔迹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在总结了各地农村互助合作经验之后,制订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新海连市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选择了农村工作基础较好的云台区朝阳乡进行试点,并派工作组常驻朝阳乡。

朝阳乡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发展起来,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规模较小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发展到规模较大的高级社——前讲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由16户发展到132户,最后发展到578户,占全乡总户数的93%,受到江苏省委和徐州地委的重视。朝阳乡的农业合作化经验相继刊登在《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1955年下半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推动全

国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求各省、市总结办得好的农业合作社的经验上报中央。江苏省委根据省委农工部和徐州地委的建议,指定新海连市委总结朝阳乡前讲农业合作社的办社经验。市委责成市委副书记郑鹤同志(分管农村工作)和市委办公室秘书刘明宣同志负责总结起草这份报告。1955年8月底,郑鹤、刘明宣还有工作人员武心铎三位同志进驻朝阳乡,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写出初稿,经市委常委集体审议修改,于1955年9月21日上报省委和徐州地委。当年10月初,市委又派刘明宣、武心铎和张传德(时任朝阳工作组组长)三位同志到南京和省委办公厅同志共同修改定稿,当时确定文章的题目叫《社越大,优越性越大》,由江苏省委办公厅正式上报党中央。由于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成绩突出、行文朴实、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一举被党中央选中,毛主席主席亲笔改名为《大社的优越性》并加上按语,编印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中册(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册,江苏省共计被收进7篇典型材料)。

1965年,江苏省举办农业展览会,指名要展出朝阳人民公社的事迹(1958年公社化时,前讲农业社改名为朝阳人民公社)。为此,市委派刘明宣和报社摄影记者来俊华同志去北京向中央办公厅请示索取毛主席批示手稿的复印件,中央办公厅同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告知:“毛主席是在1955年12月的一天夜里12时之后,读到这篇文章,加上按语,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并将标题改为《大社的优越性》。”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后,朝阳经验传遍中华大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市人民,朝阳乡的工作也一直走在全市和徐州地区的前列,成为



省、市的试点乡。1965年,江苏省委提出“地学苏州、县学启东、社学朝阳、队学华西”的口号,把朝阳和华西大队并列。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5月,省委办公厅根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要求,曾派调查组来朝阳核实《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真实性,调查结果充分表明《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真实无误。

冒着政治风险,整理“包产到户十大好处汇报提纲”

1961年初夏,市委接到通知,中共华东局常务书记魏文伯同志要来江苏进行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可行性调查研究,新海连是调查重点之一。市委决定由市委副书记杨玉牛带领农工部副部长陈富荣、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明官、办公室秘书张学贤、武心铎等人去朝阳公社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朝阳公社的社、队两级干部和部分生产队长,还有云台、中云公社的主要领导,共计20余人。

杨玉牛同志说明来意后,希望大家围绕当前农村是否可以试行“包产到户”发表意见,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保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

由于“大跃进”、公社化的折腾,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农民生活极度困难,如何摆脱困境,为农民寻找出路,本是许多农村干部迫切关心的问题,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特别是经过整风反右之后,人人谨言慎行,对“包产到户”这样的敏感话题,谁也不敢触及,所以会议一度冷场。经过反复动员,加上有一位大队干部带头放出第一炮,会议才逐渐活跃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就像山洪暴发,一泻千里,谁也阻挡不住了,会场上你一言、他一语,频频举手,插话不断。开始还有几句反对的声音,很快就被赞成“包产到户”的浪潮压倒,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直到凌晨四时才不得不宣布休会。散会前,杨玉牛同志一再强调,“今天讨论的话题,不得外传,平常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会后要把讨论十多个小时的内容,在两个小时内整理成文字报告,供杨玉牛书记当天上午向华东局领导汇报,实在难以做到。刘明官同志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干挖”的办法,把大家赞成“包产到户”的

意见分类梳理出来,不分析,不议论,也不列举发言者的身份和姓名,整理成口头汇报材料,也不打印成文(时间也来不及打印)。当时我们梳理“包产到户”的好处共有十条,刘明官同志随手写下一个醒目的标题“关于‘包产到户’十大好处的汇报提纲”。

事隔多年,这十大好处已记不全了,十年前,我和心铎同志再三回忆,才想出以下几条:

“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出勤率。公社化以后,上班要吹哨子、敲钟,生产队长要上门挨家挨户催叫。包产到户后,农民为自己干活,青壮年上工不用催,老人、小孩也会主动找事干,生产还能搞不好吗?

“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活质量。公社化以后,干活一窝蜂,追求进度,不讲质量是普遍现象。包产到户以后,农民为自己干活,就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谁也不会干那种不讲质量、损害自己的傻事。

“包产到户”有利于增施农家肥料。“农业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公社化以后,大批人畜肥丢失,土地越种越瘦。包产到户以后,农民会主动积肥,每天黑青青起床,背着小粪筐,拿把小铁铲,到田头庄后转上几圈就是一筐粪,一年积攒下来就可观了。

“包产到户”以后有利于增强团结。公社化以后,实行派工制,评工记分,干部营私舞弊现象增多,工种分配不合理。尤其是评工记分没有科学指标,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实行包产到户之后,这些矛盾就自然消失了。

“包产到户”有利于精兵简政。公社化以后,农民的衣食住行都要管,加上评工记分,年终制订预决算方案,干部忙不过来,就靠增加编制。几年下来,公社、大队、生产队人满为患。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自己管自己,许多事情不用干部操心,据大家估算,实行包产到户后,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可以减少一半,既能减轻国家和农民的负担,还能腾出一批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充实到生产第一线,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朝阳座谈会第二天,华东局常务书记魏文伯同志在塘沟望海楼召集徐州、淮阴地委及新海连市主要负责人会议,听取各地调查情况汇报。当市委副书记杨玉牛同志汇报到朝阳座谈会情况,基层干部总结出“包产到户”有十大好处时,魏文伯书记赞许



地说：“我跑了华东几个省才总结出七条好处，你们总结出十大好处，真是了不起，要是再能试试点，那就更好了。”

要不要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在市委常委内部争议较大，反对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同志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中央和省委没有明文规定；二是怕搞“包产到户”试点与毛主席批示的《大社的优越性》相违背，最后只同意在少数生产队搞“包工到户”和在渔区搞“包产到船”试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把朝阳讨论“包产到户”作为市委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罪责之一，大张旗鼓地进行揭发批判。但由于当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同时在汇报提纲中也没有列出发言人的姓名和身份，所以主要罪责完全集中到市委副书记杨玉牛同志身上。当时参加讨论、支持包产到户的同志，除在斗私批修中作自我检查外，大都没有受到冲击和伤害。

刘明官同志当时敢于冒政治风险，协助市委整理“包产到户十大好处的汇报提纲”，又坚持不列出发言者的姓名和身份，不把如此重要的汇报材料打印存档的做法，保护了许多关心群众疾苦、敢于讲真话的好同志。

晚年发挥余热，主编《朝阳在前进》

因劳累过度，刘明官同志晚年疾病缠身，每天靠药物支撑，但心里还是经常挂念朝阳的发展。1997年初，刘老萌生一个念头，想为朝阳镇（1997年1月撤乡建镇）编辑一本发展史，在取得市委农工部、市委党史办、中共云台区委和市档案局的支持下，着手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在市委几位老秘书和老部下的协助下，于1997年12月底编印成册，书名叫《朝阳在前进》，作为连云港市党史资料丛书，在全市交流发行。

该书收进10篇文献资料，10篇典型材料，并附有朝阳镇的全面介绍和朝阳镇的历史大事记和图片。重点是毛主席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加写的按语手稿，以及1955年9月21日市委呈报给党中央办公厅的《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经验总结》和1993年8月刘明官、武心锋同志撰写的《回忆毛主席为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经验总结加写按语》的具体过程。还收进《新华日报》从1965年9月到1979年12月公开发表的6篇长篇通讯，包括《朝阳十年》《朝阳人铁臂绘新图》《大干促大变》《充分发挥集体化优越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山海湾盛开栀子花》《花果山上的育树人》，足见省报对朝阳典型的重视。

今年是《大社的优越性》一文被党中央和毛主席选中60周年，当年受市委委托，负责调查总结朝阳乡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经验的几位同志已相继离世，笔者撰写此文，以示对上述几位老同志的怀念和敬意。同时也希望青年一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鼓舞斗志，攻坚克难，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目标奋斗不息。

（作者单位：市委统战部）

责任编辑 张伟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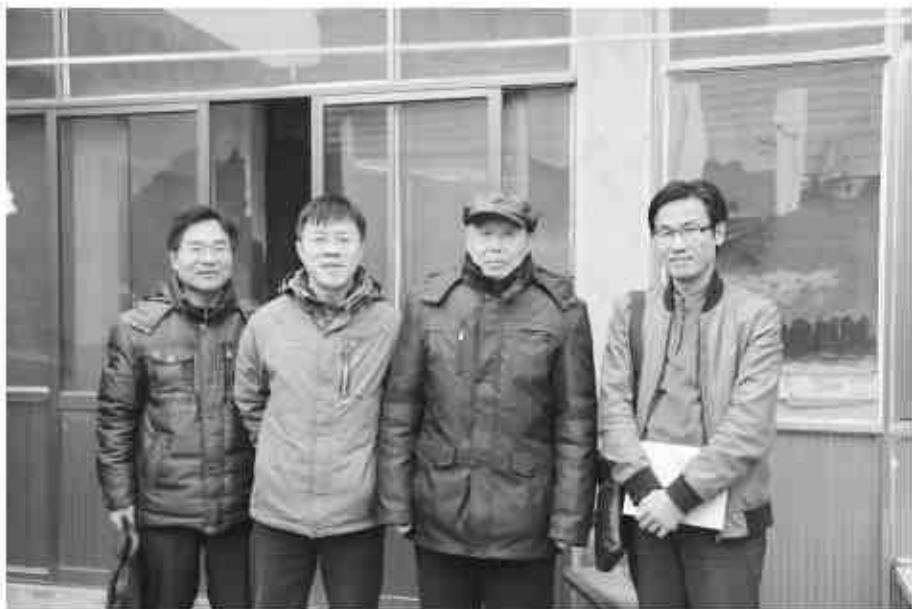
1988年8月，刘明官（前排左6）陪同原市委副书记郑鹤（前排左5）与在朝阳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合影（前排左7、左8分别是张传德、武心锋）



孙金科和他58年的

「反战情结」

祝新华



2015年2月,笔者(左1)与市委党史工办领导魏鹏(左2)、王滨(右1)等拜访孙金科(右2)老人

“抗倭保国有外援,洋人入境来抗战。得道多助失道寡,日人抗日传美谈。”对于“外国八路”参加中国抗战,人们是由衷地钦佩与礼赞。笔者现特介绍一位因为崇敬日本人反战而毕生从事这一专题研究的学者,他叫孙金科,曾被日本华语报纸《中国实报》称为“国际上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第一人”。

今年已经八十高龄的孙金科,研究日本人民反战运动已有58年之久。作为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及抗日战争史学会会员的孙金科,先后出版了《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国统区日人反战运动》等5部专著,发表“反战”论文80多篇,文稿超200万字,是国际研究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史的知名专家。

苦难的身世引发研究热情

1935年4月,孙金科出生于上海的一户贫苦人家,靠父母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做苦工勉强维持生计。没成想,两年后的“八·一三”淞沪战役,又致其家破人亡,祖母被炸死,被迫流离失所,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痛恨战争渴望和平的种子。新中国成立后,他与



家人定居南京,并顺利读完了小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孙金科,毅然写了三份血书,积极要求参军,到抗美援朝最前线。申请很快被批准,他被编入步兵团赴朝参战,可一年后的1952年春,因身体原因被送回国内的黑龙江,就近疗养,并由苏联专家帮助学习炮兵技能。正是由于学习中遇到难题,他渴望到大学深造。1956年,孙金科由部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系学习,并担任班级团支部副书记,一年后的整风运动期间,因其不关心政治被错划成“右派”转入历史系。

1957年深秋的一天,他在学校图书馆查资料,偶然从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上看到一则介绍《在华日本士兵的回忆——反战士兵回忆录》的广告,颇为兴奋,便写信给那家出版社要求购买,可人家只同意以书易书,所以孙金科只好用一套4本《太平天国史料》换回那本《回忆录》,但寄回来的书全是日文。无奈,他只好自学日语,并几乎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购买资料,也就是从那时起,孙金科开始了长达58年的日人反战运动研究。

一件事一辈子

1960年,孙金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此时,他已将《在华日本士兵的回忆——反战士兵回忆录》一书,全部翻译成汉语。因思乡心切,他提出调回老家南京工作,可又担心“右派”帽子会给定居南京的母亲、姐姐、妹妹等至亲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主动要求来到江苏省最艰苦最偏远的地方——徐州地区赣榆县厉庄中学,从事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工作。偏僻山乡来了位大学生,是件稀奇事,因而当地人对他都很有尊敬,学校还特地给他安排了单间宿舍,这也为他能持续研究日本人反战运动提供了方便。

教学之余,孙金科几乎把全部时间、精力和收入,用于自己的研究,查找资料、购买资料、整理资料,凡是与日本士兵反战有关的,他都尽可能地涉猎,想方设法去搜集,徐州、南京、济南等地的各大图书馆,他都走访过,甚至去过多次,有些资料,国内没有,他就从日本邮购。几年下来,他积攒了上百本资料,写了1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可后来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让孙金科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所有资料被查收,文稿被销毁。等十年浩劫结束,上级组织做出“孙金科没有通日叛国”的结论,他才从被造反派监管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恢复其学术研究的自由。但直到1982年,中日关系有所好转,孙金科才真正焕发出其反战运动研究的青春与活力。当年,他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5000多字的《日本人民在华反战运动研究》论文,寄给中日友好协会,并经协会推荐很快在一家权威杂志发表。第二年春,孙金科应邀参加中日友好协会年会,有幸被吸纳为中日关系史学会及抗日战争史学会会员。

为搞清我党1940—1945年在延安设立的一所专门收留日本战俘的“日本工农学校”,孙金科从多方面收集史料,遍访所能找到的每位知情者、当事人,甚至找到了当年的副校长、后来的国家中联部秘书长赵安博,并经赵老引荐见到了王震将军。王震对他的研究给予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鉴于其研究成果卓著,1990年他被破例改行调入赣榆县政协,专门从事文史编研工作,1995年退休。直到现在他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1996年出版了《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一书,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在日本国内、中国解放区、中国国统区等地,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全部过程。随后,又相继出版了《鹿地亘——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国统区日人反战运动》《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等专著,还受聘南京师范大学“编外”教授,专门为该校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研究生开设《关于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研究》专题讲座,并受命组建连云港市社科院反战研究所,与淮海工学院联合培养“反战”专业研究生。去年,他更是不顾年老体弱,出版了由原国务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宋健题写书名的《中日人民友谊结晶——解放区日本工农学校揭秘》一书,并被列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丛书。

与日共领袖携手“反战”

1990年,为进一步拓展对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的学术研究,孙金科订阅了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并从报纸上了解、结识了不破哲三这位1930年出生的日共领袖、著名历史学家。孙金科多次写信给不破哲三,介绍自己的研究情况,并寻求学术上的支持和帮助。不破哲三寄给他大量有关反战同盟领导人的资料,并介绍他与健在者直接联系。他们互相交流研究成果、交换资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6年,孙金科应中宣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之邀撰写的35万字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一书问世后,立即将他签了名的新书寄给了不破哲三先生。经这位日共领袖的宣传,该书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98年10月,在不破哲三的帮助下,孙金科应日本日中历史研究中心、东京早稻田大学和京都立命馆大学联合邀请,前往日本参加学术研讨会,并到各高校讲学。他先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参加了“在华反战同盟研究国际座谈会”,并发表《我是怎样研究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的》长篇演讲;应邀到东京骏河台大学历史系作了《在华日人反战先烈金野博》的长篇演讲;到京都立命馆大学参加“在华反战运动国际研讨会”,作了题为《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的研究情况和今后任务》的主题发言,并在日本出版。他所到之处,均受到日本专家和当地人民的欢迎,人们由衷地称他为“反战勇士”,赞扬他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他的“反战情结”令人钦佩。

在2002年11月初,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不破哲三专程访问中国,并在与江泽民总书记的会谈中,他多次提到孙金科,提到了《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这本书,盛赞孙金科为新时期的“反战勇士”,这些都载入不破哲三回国后出版的《北京之五日行》一书。

走进央视当“导演”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联合拍摄五集电视剧《呼唤和平》。这是一部首次从日本战俘的角度反映中国抗战的大型文献专题片,孙金科受聘担任学术总顾问。

据孙金科研究的反战史料表明,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00余人,其中10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经历了生与死、灵与肉、爱与恨、血与火、战与和的洗礼。他们毅然投身于抗战前列,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建立了20个反战支部,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反战之歌。

2005年春节过后,《呼唤和平》剧组分三个摄制组奔赴苏鲁豫、湘浙赣等国内20多个省市实地拍摄及远涉日本采访抗战亲历者。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专程到赣榆县,采访孙金科,商谈史料采集等。之后,孙金科还请摄制组来到当地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赣榆县抗日山烈士陵园,实地拍摄墓冢安放于此的反战英雄金野博烈士的反战事迹、纪念碑等。金野博(1919—1944),是抗战时期山东滨海区日人反战同盟牺牲的最高领导人。他出生于日本国本州秋田县,1939年秋参加侵华战争期间为我军所俘,经教育后自愿参加“反战同盟”,任“日本解放联盟”山东支部宣传委员。1943年,他到日照、赣榆两县做反战工作时不幸被俘,并被日军杀害。1991年,赣榆人民在抗日山烈士陵园兴建了金野博烈士纪念碑。1998年,利用赴日讲学之机,孙金科在不破哲三的资助下,曾专程到秋田县寻找金野博的家人,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音讯。

《呼唤和平》这部电视剧文献纪录片于2005年9月3日晚在央视七套播出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纷纷要求重播,后分别在央视一套和四套黄金时间播出。这也是孙金科第二次与央视结缘,专题阐述日本人民反战运动。2003年8月,孙金科曾受央视特邀主讲《探索·发现》演播室,专门向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诉说自己46年的“反战情愫”。

(作者单位:赣榆史志办)

责任编辑 于冰清



中国古岩画

李 晗

艺术探析

中国古岩画艺术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是华夏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最集中体现。总的看来,中国岩画可以大体划分为北方、西南、东南三个系统。北方系统的岩画,主要分布在内蒙、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从岩画题材看,内容以动物为主,风格较写实,技法大都是岩刻。它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狩猎、游牧民族的作品。具有浓烈的草原气息,是狩猎、畜牧业经济形态在岩画艺术上的反映。北方岩画以内蒙古、宁夏的岩画最有代表性。西南系统的岩画,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贵州、四川。从岩画题材看,内容以人物的活动为主,反映了当地居民狩猎、战争、村落、舞蹈等社会生活情况。特别是宗教活动为其主要的表现内容。作品技法则以红色涂绘为主。西南地区的岩画中以云南、广西的岩画最有代表性,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东南沿海地区的岩画,主要分布在江苏、福建、广东、台湾和港澳等地,东南沿海地区岩画以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为代表。从岩画题材看,大都与古代先民们的出海活动有关。内容以抽象的图案为主,都采用凿刻的技法。

纵观全国各地发现的原始岩画,其艺术风格大体可以分为“写实”和“抽象”两种。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的岩画多以写实为主,追求形似,以模仿对象为目的,而晚期的风格则转为抽象。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转变?这要从古人凿刻岩画的目的中去探索,从人类思维能力不断的提高过程中去分析。岩画虽然是美术的一种形式,但作者原来的出发点并不只是在于审美,还存在着功能上的考虑,如原始崇拜、巫术和祭祀等。

一、动物形态表现方式(以内蒙古阴山岩画为例)



动物是古代草原民族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生活之源。阴山岩画的动物图像极其丰富,占到整个岩画总数的90%以上。在那裸露的石壁、山崖上面,凿刻着许多十分生动的大型动物形象。有山羊、绵羊、羚羊、大角鹿、马、骡、驴、野牛、野猪、狼、虎、豹等。这些动物形象极具动感,或引颈长嘶,或回首短鸣,或漫步缓行,或四蹄腾跃。栩栩如生的图画,使人仿佛置身于动物世界。



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留下的畜牧类型的岩画比较丰富,内容有狩猎、放牧、游牧等场面。从时间上看,畜牧类型岩画的年代明显晚于狩猎类型岩画。早期的狩猎岩画,描绘巨大的动物和抽象的符号,但没有构图的场面,它们被刻画在如今已是沙漠或半沙漠地区的山崖上。后期狩猎者岩画,描绘人物带着弓箭,进行狩猎的场景;有一人狩猎、多人围猎;甚至在新疆的有些岩洞里发现了滑雪围猎的场景;也有人与兽搏斗,兽与兽搏斗等场景,每个动物的身体比例都很协调,画面非常逼真。从整个狩猎岩画的内容可以推断出:这些被刻画在岩石上的动物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这些狩猎民族食物和衣物的主要来源。

二、人物形态表现(以广西花山岩画为例)



自从产生原始文化艺术以来,文化生活就同物质生活一样,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岩画是造型艺术,以可视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是以人像为主的岩画,目前已发现的人像占全部图像的95%以上。从整个岩画群来看,人像的造型比较简单,主要有正面和侧身两种姿势。

一是正面人像:一般为两臂向左右两侧展开,屈肘向上举。腿朝两侧分开,屈膝半蹲,与手臂相对称。这类人像贯穿岩画的始终。二是侧身人像:双臂自胸前伸出,屈肘(或不屈肘)举手。双腿前迈,屈膝

半蹲或不屈膝站立,上下对称。在上述类型的基础上,人像个体间的姿势也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别和变化:如头饰的有无,头部、身躯的造型,人体的高矮、胖瘦,举臂的高低,分臂(腿)的款识、宽窄,手指的变化,屈肘(膝)或不屈肘(膝),执物或不执物,以及装束等等,都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各具特色。

宁夏贺兰山岩画人面像的外轮廓大都呈椭圆形,也有圆形、方形、心形等。外轮廓的线条一般都刻画得很深。如果你仔细端详,会发现他们面目各异:有的五官俱全、有的却只有眉毛和鼻子,或者只有眼睛;有的耳朵很大,有的像小丑一样滑稽的大鼻子;有的侧面如骷髅,充满了神秘奇诡的气氛。人面像的表情也是各有千秋。他们有的双眼倾斜、冷眼外望,表达出一种傲慢不屑的神情;有的嘴角上翘,带着女性特有的温柔、慈爱的笑容。这种人面像的外轮廓大都呈方形,让人不由得想起天圆地方的说法。

三、舞蹈场面(以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为例)



舞蹈场面是阴山岩画常见的内容,在磴口县西北部斯台沟岩画、乌拉特中旗的乌珠尔岩画都可以看见牧人的舞姿。他们在山色秀丽、风景优美的山沟中,在面向太阳的巨石上翩翩起舞。无论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舞姿多是双臂高扬或双腿叉开,因此有人推测他们是在庆功或是在举行某种宗教祭祀仪式,或许也只是牧人们沉醉于那里自然景色的美好,来表露自己的舒畅心情吧!



从岩画上古人的舞姿,我们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是在模仿动物的姿势,可能是狩猎者的舞蹈,有男有女。这类岩画可能表达部落成员对丰收猎物后的喜庆心里,或者在部族成员出去狩猎之前为了捕获更多的猎物,并能够平安归来所进行的祈福仪式。

而广东宝镜湾岩画观雉之舞则具浓郁的宗教色彩。关于面具舞蹈祭神的溯源,可以追溯到整个人类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等远古复杂的思维意识。生活在宝镜湾的瓠越之族,崇拜太阳,对世间的雷霆风暴、海啸惊涛有着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他们为了生存,不仅要面对海洋,面对各种凶猛野兽,甚至还要面对其他氏族的压迫威胁。天灾人祸使敬神驱鬼的仪式在华南一带远古时代就异常发达。

《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蒙掌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说的是周代天子举行雉祭的巫方相氏,头戴面具,手执戈盾进行跳神的情景。远古之巫,有男也有女,男女进行招魂驱鬼或祭神敬天时的功能亦各有分工。《国语·晋语》称:“在男曰巫,在女曰巫。”《周礼》载曰:周期的巫觋进行祭祀时称“雉”。每年要在季春、中秋为国家祭祀的叫“大雉”,也叫“国雉”,腊月之时平民百姓一起参加的叫“乡雉”。巫风之盛在我国的南方不绝于缕。

四、抽象图案植物人面像(以将军崖岩画为例)



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普遍认为这就是禾、田、人三位一体的形象记录,是稷神的形象化。这是中国岩画中描写稷神的唯一一幅,特别值得珍视。

有学者说那是原始先民对土地神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学者说是原始先民对谷神的崇拜,还有学者说是古代先民纹面习俗的遗留,至今谜团未解,而所有的猜测都让将军崖岩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将军崖岩画的内容,从总体上讲是比较抽象的,其着重表现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其图案表现向简略化、抽象化、程式化和图案化发展。将军崖岩画的图案,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审美价值,而且含有写实岩画所不具有的更深刻的精神内涵。因此,对将军崖岩画内容的分析与研究,判读其精神内涵,并据此来推断其功能,是将军崖岩画研究中的重点。由于将军崖岩画的内容较为抽象,且东部沿海地区独有一处,在研究过程中缺乏互相印证的材料,所以学术界对它的内涵和功能的判定存在着很多分歧。

岩画之所以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因为它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它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它反映了古代民族的生活、愿望和追求。他有丰富的内涵,体现出他独有的特性:一是娱乐性。岩画是古代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创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赏心悦目的艺术画廊和场所。二是教育性。岩画在教育性方面最具有大众化和通俗化的特点,其丰富的内容、广泛的题材,都是用作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最普及的民间艺术和生活的百科全书。三是传承性。岩画自身就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历史,它是许多民族的共同财富,从时空讲岩画跨越了上万年的时间,它属于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就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传下来。

(作者单位:市革命纪念馆)

责任编辑 邱仕明

